



这是我2018年3月份在葛化街化工路一带拍摄的。本世纪初，左岭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武汉市著名的化工都市工业园，以葛化集团为龙头，聚集了包括武汉化工二厂在内的多家企业，颇具规模。此后左岭又作为光谷“东进”战略支点的重要项目聚集了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了华丽转身。我从2008年开始关注并拍摄武汉工业遗产保护题材，这些年共整理1500余家工厂资料，探访其中600多家，拍摄300多家约50000张照片，试图为即将消失或将来有可能消失的老工业遗产留下影像档案。回顾武汉城市的发展史，工业遗产对武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想用这些带有观念的影像展示工业遗产保护令人担忧的现状，唤起政府相关部门和市民对工业遗产保护的重视。

（摄影 / 撰文 周国献）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熊少明
董菲 杨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张智勇 陈胜利
陈红英 林伟 徐莉 潘红莲
燕来宾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许濛

编辑：章旷怡 刘玮

封面设计：王鹏

时代年轮

<<<< <

4 1954，解放大道矗立新丰碑 / 简桦

风雨同舟

<<<< <

15 我的民革路与黄埔情 / 周丽芳

九城同心

<<<< <

19 “鄂”史悠悠说根由 / 邱风 杨小杰

委员天地

<<<< <

24 从“以梦为马”到“以马为梦”

/ 马茹菲（口述） 章旷怡（整理）

28 活出生命尊严，爱心助力他人 / 熊菲

商聚汉皋

<<<< <

31 我与城市共赴“更新”之旅

/ 胡江涛（口述） 闻夕（整理）

目录

CONTENTS

人物春秋



35 涂治, 从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走来 / 裴高才 杜春华

43 刘绪贻, 在珞珈山上迎接黎明 / 胡耀 尹加加

49 武昌起义后的鄂军将领季雨霖 / 魏德勋 黄婧

史海钩沉



53 向警予秘密埋葬处补乾亭“现身” / 侯红志

扫街探疑



56 蛇山上的“十桂堂” / 杜宏英

高校访馆



61 泱泱大国礼乐兴盛的优雅回音
——武汉音乐学院湖北音乐博物馆 / 赵路花

主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价：8 元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编：430010

电话：(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1954，解放大道矗立新丰碑

◇ 简 粹

轮印：1954年10月，新中国国庆5周年之际，武汉解放大道拓宽延长工程开建，一举带来集聚效应，沿线竖起公共建筑，构成崭新都市景观。如果说，重庆解放碑是目睹山城新生的标志，那么，武汉解放大道则是见证江城变迁的丰碑。

解放大道，始于一个时代巨变。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汉口“中正路”退出历史舞台，更名为“解放大道”。

解放大道的源头为“西满路”，追踪起来与两个跑马场相关。1902年，英国商人从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手中低价购买荒地，在东郊（今解放公园一带）修建“西

商跑马场”，但刘歆生这样的华商首富也不得注册为会员。1908年，刘歆生发起组织华商赛马公会，在西郊（今航空路至宝丰路一带）修建“华商跑马场”。为方便游客前往，刘歆生修了一条土路，用他儿子的名字取名西满路，连接以他名字命名的歆生路（今江汉路）。1929年，西满路由国民政府更名为中正路，铺设为一条碎石路，总共1.8公里长。

1953年，新中国经济建设大起步，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项目“六厂一桥”（武钢、武重、武锅、武船、青山热电、肉联和长江大桥）布局武汉，其中肉联（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生产规模为亚洲第一，



1950年代的解放大道

落户汉口东部堤角。同时，武汉在汉口西部易家墩设立工业区（后称古田工业区），集聚数十家工厂和万人宿舍。此外，“西商跑马场”建设为解放公园，“华商跑马场”从上海迁来同济医学院，中山公园也扩建达600亩举办大型活动——修建一条贯通汉口的新大道势在必行。

1953年，武汉成立建设小组，解放大道规划起步，其60米的宽度引起激烈争论，在“一个铜板掰为两个花”的经济条件下，不乏“大马路主义”和“劳民伤财”之说。武汉市委、市政府着眼于未来，悉心听取各方专家意见，反复论证车流发展趋势，最后决定全线路幅60米、车流量每小时300辆、最高载重标准8吨，成就了一条“出世就不凡”的大道。

1954年10月，国庆5周年之际，武汉出台《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解放大道拓宽延长工程随即开工。据《武汉地名志》载，以60米路幅为基准，1956年建成宝丰路至黄浦路段，1972年两头延伸至易家墩（今古田一路）和堤角，1977年全线告捷。

一条长达25公里（后延长为37公里）的现代化大道，穿越硚口、江汉、江岸三个

城区，创下武汉市区主干道最长、最宽两大纪录，超越中山大道、沿江大道成为交通大动脉，很快享有“武汉长安街”之誉。直到半个世纪后的2011年，武汉大道由几条大道合并而成，才以44公里长度改写这一纪录。

解放大道腾空而起，为刷新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功能创造了巨大空间，大道两旁迅速崛起中苏友好宫、友好商场、武汉饭店、武汉剧院、青少年宫、解放公园、新华路体育场、武汉体育馆、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等公共建筑，刷新了老汉口的天际线。

一条大道，几多荣耀。毛泽东在武汉体育馆接见科技工作者，周恩来、陈毅、贺龙在武汉剧院观看《东方红》，朱德在武汉机床厂视察，贺龙在新华路体育场看球，胡耀邦在武汉体育馆陪同外宾。外宾中，来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罗马尼亚总统、阿尔巴尼亚总理、美国国防部长……

当年流行佳话：解放大道“两头是生产、中间是生活”，开辟了新城区，注入了新活力。

今天铸就传奇：解放大道像一条金扁担，两头挑起两个工业区金篓子，中间是缀满红宝石的金腰带，沉淀70年的城市文化记忆。

中苏友好宫标示“城市中心”

1956年春天，解放大道中段最佳处，中苏友好宫（后称武汉展览馆）诞生，它与北京、上海、广州的中苏友好宫一起，彰显



出全国四大都市的地位。

中苏友好宫占地 10 多万平米，面积达中山公园的三分之一，二者浑然一体，气势更为宏伟。这边，中苏友好宫两臂环抱，莲花形喷泉池水花劲射；那边，中山公园大门改建为苏式门廊，顶部观礼台彩旗招展。解放大道从中穿越而过，构出一个开阔的“城市大广场”。

5 月 5 日，中苏友好宫以“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开馆亮相，盛况空前，长达两月。这时我虽刚出生，可一床“克里姆林宫”线毯来自展览会，伴随我长大成人。尔后，每逢五一游园、十一游行，最热衷在中苏友好宫与中山公园之间穿梭，浩荡的人流是挥之不去的永恒画面。到 1976 年初秋，毛泽东主席逝世，湖北暨武汉追悼会会场设在这里，喷泉池布置成一个巨型花圈，周围垂首默哀一片人海，在新闻纪录片镜头中尤为庄严。

中苏友好宫由苏联专家指导设计，集中体现了苏联建筑艺术特色，布局开阔通透，主体雄浑恢弘，立柱挺拔高耸，门廊高阔气派，檐楣红旗簇拥五角星浮雕。从厚重的雕花木门入内，中庭穹顶金碧辉煌，俄罗斯民族彩绘浓艳迷人，中央一个枝形铜吊灯如烟花绽放，倒映在镶嵌铜丝图案的水磨石地面。中庭两边，宽大的楼梯通向曲折回环

的展厅，漫步观展如行云流水，时有误入迷宫的错觉。

中苏友好宫犹如时代窗口，不同的展览转换不同的风景，从“泥塑收租院”到“珍宝岛反击战”，从“西藏雕塑艺术”到“罗马尼亚摄影”，走进我们的多彩生活。春潮初澜之际，“北京十二人画展”“全国广

告海报展”冲破禁区，首次出现人体艺术作品，一时人头攒动。1979 年冬，鲁迅先生推崇的德国凯妥·珂勒惠支木刻巡展光临，与之完成穿越时空的邂逅，一张入场券保存至今。

随之，林林总总的展销会接踵而来，紧俏的时尚商品眼花缭乱。1980 年春节，心仪已久的“武陵牌”电唱机“几经周折，终于在展览馆不期而遇”——日记中的片言只语透着欣喜。无意拍下的几张照片，摄取了商海大潮的小小浪花，我的一张上有“1987 物资调剂会”横幅，儿子的一张上露出“武汉市展览馆家具城”竖标。儿子的一张时在 1993 年，几乎是中苏友好宫的最后影像，它在 1995 年消逝，2001 年建起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1995 年 5 月 2 日，著名城市建筑规划学者张在元博士接受采访时认为，武汉由于长期分为三镇而缺乏一个中心，有了解放大道航空路至中苏友好宫核心地段，武汉才形成了一个中心。当天的日记不乏他的动情之语：“这个地方是武汉的中心，为城市留出了一个虚拟空间，我在喷泉池边散步的那一会儿，感觉城市拥抱着我。”当年，指导武汉制定城市规划的国务院城建总局顾问、苏联专家巴拉金也提出：武汉应以中山公园前的广场为市中心。

如今，中苏友好宫唯一存在的印记，恐怕是它右手的“友谊路”。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问武汉，经民意二路前来中苏友好宫，这条路由此更名以作纪念。

友好商场直追“北京王府井”

友好商场（后称武汉商场）与中苏友好宫相邻，会同武汉饭店、汉口饭店、航空饭店及建工大楼、广播大楼，蔚为解放大道核心地段的精华景观，时常出现在报纸头版或日记本封面。

中苏友好宫开馆之后，人流骤然大增，购物需求高涨。1956年5月，武汉市百货公司来此设立“实验商店”。小小供应点，300平方米，显然适应不了解放大道日益强大的聚合力。1957年5月，武汉市一商业局决定兴建友好商场。

1959年9月，友好商场拔地而起，与武汉剧院、武汉工艺大楼一起作为“三大建筑”，向国庆10周年献礼。

友好商场主体六层塔楼高耸，总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营业面积7400平方米，



不仅远超江汉路中心百货大楼，而且以新中国第二座大型综合百货商场，紧随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之后。

国庆节前夕的9月29日下午3时，友好商场隆重开业，市长刘惠农亲临剪彩，各界来宾683人出席，外国友人达100多位。开业4个多小时，顾客2万多人，营业额5.6万余元。第一年，营业额达到1786万元，实现利润102万元，令人刮目相看。

少年时代，游公园、看展览后的“余兴”，就是逛友好商场瞧热闹。上班后荷包有钱了，特别是谈恋爱那一阵，不去友好商场光顾一番，就有消费落伍的感觉。

友好商场的规模，与现在万达一类商业综合体相比也不逊色。好友夏学诗在三楼钟表柜当营业员，一次邀请我入内俯瞰中庭，柜台组合美妙图案，顾客徜徉川流不息，用今天的话说感到“震撼”。商场一楼设置了食品柜、糖果柜，有一般副食商店鲜见的琪玛酥、花生占，差不多每次去都要买一点品尝。花生占是裹了糖霜的花生仁，在那个年代挺新奇，现在已不见踪影。

一次看到人群涌动，争相叫嚷“毛巾被”，挤进去购得一床时髦的提花新款，

好久可向亲友显摆。今天，衣橱依旧挂着“好来西”衬衣、“袋鼠”西服、“奔驰”皮夹克、“九州”羊绒外套，无不来自友好商场，资历最嫩的也有20多年。

友好商场在大楼后侧设有友好礼堂（后称武汉一商业局礼堂），那时购物前后看电影已成标配。由于区位优势，友好礼堂人气非常，每天在报纸电

影广告栏占据醒目位置。1976年后，老电影重映一票难求，我却看了不少紧俏故事片，因为夏学诗的妈妈在礼堂售票。1977年1月3日日记有此一笔：“应夏学诗之邀请，浏览中山公园，并观看了《暴风骤雨》《永不消逝的电波》

两部影片。”此后举办“罗马尼亚电影周”，1978年8月25日日记又有留痕：“约鹏喜、守明、建国一起去商场礼堂观看《橡树，十万火急》。”

当高铁替代了特快，武汉商场老楼焕新，蝶变为武汉商场、世贸广场、国际广场三座并立，傲然打造“华中第一商圈”。2022年10月28日，“武商梦时代”跨江到武昌惊艳揭幕，为全球最大商业体“巨无霸”。

武汉饭店跻身“全国十大”

从友好商场上行，航空路口一处，居然挺立三大饭店——武汉饭店、汉口饭店、航空路饭店和一座地质大楼，亮出解放大道最为著名的“十字街头”。

武汉饭店呈八字形占据一角，一幢八层大楼，两座六层附楼，再两座四层附楼，山峰一般绵延。

武汉饭店1963年竣工，开始叫“解放大楼”，连同对面一家四层楼“解放副食商店”，大名皆因解放大道而来。

武汉饭店建筑面积近一万平方米，拥有客房359间，位列“全国十大饭店”之



一。官方大型会议轮换落座其间，门楼拉出的欢迎横幅十分显赫，不由望而却步。直至1981年，好友吴锐结婚在饭店餐厅办酒，才得以入内一窥风光。其后，饭店舞厅“夜乐园”对外开放，摩登男女趋之若鹜。

旅游初兴，武汉饭店抢得“第一桶金”，进口大巴车来来往往，外国游客花花绿绿，引人驻足围观。最早的“庐山游”“西山游（鄂州）”从这里发车搅热全城，我与弟弟赶了一趟新鲜。大楼一旁设有全市第一批出租车场站，孩子在同济医院出生，新爸爸大多跑过来叫车回家。

汉口饭店先于武汉饭店落成，源于1956年接待中苏友好宫的苏联专家和参展人员，为解放后兴建的第一家涉外饭店，与老牌子璇宫、德明、胜利饭店并称“江城四少”。

航空路饭店几乎被大家忘却，早在1987年转型“长江大酒店”爆得大名，盖过以往光环。“长酒”的西式自助餐不胫而走，我与好友几番慕名而去，无不以品尝为荣。

如今，长江大酒店仍在经营，汉口饭店地块即将开发，武汉饭店早在1994年停业拆除，让位给了“新世界”。

武汉剧院耸立“艺术殿堂”

从中苏友好宫向东走，越过江汉路口，车水马龙中豁然开朗，一个小广场高高的台阶上，武汉剧院庄重风雅。大理石柱门廊，红旗五角星浮雕檐楣，艺术神韵与中苏友好宫遥相呼应，只是体量小得多，但门前一座伟人雕像又增加了气度。据说，在公共场所，这座雕像目前为汉口唯一，整个武汉也只有三座——另两座在关山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和青山武钢厂前广场，静静定格出“年代感”。

65年前的国庆10周年之际，武汉剧院与友好商场一同呱呱落地。谁也不会想到，它所在的地方曾是荒丘坟地，俗称“棺材山”。在《老照片上的武汉》一书中，1911年的老明信片显示一块停放数十副棺材的丘地，1922年的老地图标注为“棺材山”。端详两旁江汉路、黄石路的坡道，有迹可循。

武汉剧院凿山平地，筑起一座艺术殿堂，荟萃歌剧、芭蕾舞、交响乐高雅艺术，接纳中外一流顶尖艺术团。记忆中，它从不放电影，唯有舞台呈现，保持自身个性与品位。



1965年，全国唱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武汉人艺演出颇具水准，在武汉剧院迎来周恩来总理，陈毅、贺龙副总理观赏，受到称赞。我第一次进武汉剧院也在这一年，观看武汉人艺话剧《年青一代》，此剧也是风靡一时。

改革开放之后，武汉剧院拥抱环球，世界经典纷至沓来，意大利歌剧、俄罗斯芭蕾、法国交响乐、巴西桑巴舞……每每得风气之先。新年音乐会年年举办，武汉人多了个迎新仪式，那种正装出席让人肃然“高贵”。作为京剧粉丝，又见识了太多“天团阵容”，纪念谭鑫培、梅兰芳、周信芳大师的演出，大角云集的火爆不可复制。至今，“武汉戏码头”在此连续举办十二届，打响全国性戏曲盛宴品牌。

武汉剧院驶出一艘“旗舰”，解放大道沿线影剧院群起跟进，组成浩浩荡荡的“编队”——江汉工人文化宫、硚口工人文化宫，五一俱乐部、武机俱乐部、军工俱乐部、长江俱乐部，友好礼堂、黄埔礼堂、江岸剧场、七一电影院……一个个就像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共奏江城交响曲。

青少年宫兴建“自己动手”

武汉剧院小广场视线开阔，遥对青少年宫高高的跳伞塔。往日，这边是棺材山，那边是野湖荡子。1956年，团市委发起义务劳动，少先队员和团员青年自己动手，社会各界和解放军热忱相助，百万人次，一个冬春，硬是让芦苇丛生的沼泽地，飘出了“让我们荡起双桨”。

如今，艺术宫和音乐厅交叠，组成青少年宫的新潮大门。当初，可是一条林荫大道纵深到底，直通人工开掘的“四方湖”，



比起中山公园来更加野趣横生。夏天满是蜻蜓飞舞知了鸣唱，捉迷藏、跳三关玩累了，蹑手蹑脚钻进阅览室看书报，是周围玩孩的共同经历。

当上大队委员，去青少年宫参加全市“队日”活动，最吸引人的不是篝火晚会，而是航模、伞塔和小乒乓球队。1965年，第28届世乒赛举行，守在收音机旁听实况转播，庄则栋再度夺冠，乒乓球热蔓延全国。报名参加青少年宫乒乓球集训，高手如云很快淘汰，连捡球的份都轮不上。

“四方湖”畔有一座吕锡三塑像，他是球场街小学少先队员，1959年为救落水小孩而牺牲。戴上红领巾曾来瞻仰，年近花



甲又来寻访，那天刚好是六一儿童节。2012年日记中有这么一段：“青少年宫，参加开心运动会，几乎走遍各个角落，找到就在体育场近旁的吕锡三塑像。1960年六一儿童节竖立，董必武题写碑名。塑像已是周身斑驳，如同一段树皮开裂的老树干，好在系上了鲜艳的绸子红领巾，仿佛飞来一片红霞。吕锡三1947年生人，献身于今已覆盖在建设大道之下的黄孝河。他和刘文学、张高谦一大批少年英雄，是我们最初的记忆。”

1972年上了高中，青少年宫“重走红军路”火了，模拟“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间有“抢渡大渡河”“飞夺铁索桥”的刺激，武汉伢差不多都要来一回，据说超过200万人次。

到了儿子一代，“水上世界”“未来世界”转换画风，新型游乐、科幻项目扑面而来。到了孙辈一代，又是“舞蹈班”“朗诵班”人气爆棚，从青少年宫少年合唱团走出的撒贝宁，当起了家长追捧的新偶像。

解放公园夺冠“城市湿地公园”

1955年5月16日，武汉解放6周年之时，解放公园对外开放。它由西商跑马场变身为人民公园，一扫殖民色彩，视为天翻地覆的象征。

解放公园的最大特点就是“最大”，在全国名列前茅，占地面积达46万平方米。前门面临解放大道，后门抵达惠济路，方圆之间承载厚重的城市史。左边永清路过去是日本兵营，1911年武昌首义爆发，日本借口“保护侨民”驻扎“中支那派遣队”，1922年被迫撤出后，又在原址建日本公园、竖“客星有光”纪念碑张扬；右边解放公园路旧名“渣甸路”，1905年为配套西商跑

马场而修建，路名来自英国怡和洋行创始人威廉·渣甸，路边别墅“怡和村”住满了洋人大班。

解放公园比青少年宫远了许多，1972年上高中才第一次去。1975年国庆期间从知青点回汉，抽空拜访历史老师，10月3日留下一段追忆：“翻开高中时写的日记，《四十银元三条命》《东湖之行》《博物馆里》《九女墩前》《蛇山上的星期天》《站在二七纪念碑下》《苏军烈士墓旁所想到的》……一篇篇映入眼帘。这是我们历史研究小组在历史老师徐力的辅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后，我写的一部分家史、访问记、参观记。”



认识解放公园，正是从《苏军烈士墓旁所想到的》开始。那个年代，尽管中苏关系处于特殊时期，但报纸上年年有为烈士墓扫墓的报道，武汉人不忘苏联空军志愿队血战江城蓝天的壮举。1956年，15位苏联空军英雄的遗骸，从六合路“万国公墓”移葬过来，安放在朝梅岭与夕桂山之间，墓前竖立四方锥形纪念碑，游人走到这里会安静肃穆下来。

解放公园的另一地标是“八骏奔马”雕塑，据说取意于徐悲鸿的名作《八骏图》，

不知是否也暗示往日的跑马场换了天地。八匹白马昂首掀蹄，映照蓝天绿地大气醒目，孩子们老远就像马驹一样撒腿奔过来，上下任由攀爬跨跃。我们祖孙三代皆与“奔马”亲近过，其间数十年时光跨度，真如“白驹过隙”。

今年高中毕业50年，我们班的聚会相约解放公园的春天，老来白发对接青春红颜，特意选择苏联空军烈士墓和“八骏奔马”大合影。穿行森林草坪，踱步湖畔石桥，这里已是全国第一个城市湿地公园了，莺飞草长原生态，为人们提供了打卡的充足理由。

新华路体育场跃身“全国一流”

小时候到中山公园，总要扒在网球场外看运动员练球，那边还有一座高大门楼越出墙头，知道它是新华路体育场的西观礼台。

不知道的是，新华路体育场与中山公园有关、与刘歆生有关。1914年，刘歆生在通往华商跑马场的途中，安下一座私人花园“西园”，内设游泳池、网球场、足球场。1929年西园扩为中山公园，1934年足球场扩为汉口体育场。1938年武汉沦陷，日军的军营和马厩进占，弄得千疮百孔。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恢复为中南体育场。

1954年中南体育场升级，投资350万元，占地135亩，建筑面积16982平方米。1955年4月建成，跃身为全国一流综合性体育场，后来随着路名改称为新华路体育场。

第一场比赛是最博取眼球的足球，又是中国国家队迎战匈牙利国家队，球迷节日一般赶场，国务院分管体育的副总理贺龙元帅亲临观看。匈牙利国家队位列世界前三，媒体大聚焦，尽管国家队输了球，新华路体



育场却赢得知名度，从此担当国家队、湖北队、武汉队的主场，绿茵旋风一次次起落武汉伢的喜和忧。

母校武汉四中乃“足球名校”，拥有一座标准足球场和四百米跑道，自豪写在我们脸上。到了参加全市中学生运动会，坐上新华路体育场高高的看台，中山公园都在鼻子底下，这才叫大开眼界。

新华路体育场显然移植了苏联体育场范式，同时又融入中国古典宫殿建筑元素。前后两个大观礼台，玫瑰色红墙，宫门式入口，门沿装饰花纹浮雕，三楼凹入石雕栏阳台，中西合璧十分耐看。

新华路体育场一次能容纳3万观众，围圈20个出入口，两层看台21排如层层梯田（1984年增加到28排）。1972年，一支外国球队来访，纷纷传言新添了“无影灯”，晚上踢球没有人影干扰，果然从场外看到高高伸出的灯柱。

新华路与解放大道交汇处，一家小餐馆“借光”



名之“体育餐厅”，颇受球迷青睐，看球先来扒拉一碗热干面垫底。如果心仪的球队胜出，门外一定会摔出一堆啤酒瓶。

城市体育场往往是政治、文化活动中心，新华路体育场也是如此，重大集会、盛大晚会、大型团体操、备战总拉练，动辄万人潮涌，场面十分壮观。1967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谢胡访问武汉，10万人在此集会欢迎。

新华路体育场，也是社会情势的“晴雨表”。武汉市民都会记得，几度“严打”营造声威，都在这里举行公判大会，场外集聚的人群拥堵到了解放大道。改革开放后歌舞升平，港台歌星走马灯似巡回登台，每每引爆热浪胜过足球大赛，我也撞上一回张信哲，掉进少男少女狂欢的漩涡，眼前只剩下荧光棒迷离挥舞。

新华路体育场最为特殊的一页，应当要算2020年2月1日，武汉协和医院告急，一架直升飞机降落中央草坪，卸下3000多套防护服和20000多只口罩，真正属危难之际“雪中送炭”。

武汉体育馆无愧“冠军摇篮”

与新华路体育场相距不远，崇仁路口有它的“小弟”武汉体育馆，却早于“大哥”出生，1956年5月6日开馆，在中苏友好宫开馆的第二天。



武汉体育馆是苏式风格，五座大门的石材装饰，三层通体立面宽大，衬着红色外墙特别突出，颇像一名健硕敦实的运动名将。它的投资不过160万元，在今天买不到一栋小户型住宅，当年竟占地13122平方米。30年间承担室内公共体育活动，举办国际赛事80余场，直到1986年让位于洪山体育馆。

武汉人不会想到，武汉体育馆出现过一代伟人的身影。1958年4月6日，武汉科学界誓师大会在此召开，毛泽东主席亲临现场，5300名科技工作者群情激奋，自发唱起《东方红》响彻大厅。

毛主席向大家频频挥手，与大会主席团成员一一握手。武汉

市建委副主任、著名建筑学家鲍鼎同主席相谈，定格了武汉体育馆的一个历史时刻，传播甚广甚远。

武汉人也不会想到，武汉体育馆远在华中腹地，却也连通五湖四海，充当“外交舞台”接待显赫外宾。

1980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问武汉，在我这小青年10日、11日两天的日记中留有记载：“鹏喜告之，美国国防部长明日私访武汉造船厂，因与该厂总工程师是老同学”“大桥上巧遇鹏喜，因布朗车队经过，交通堵塞。我们乘电车到武胜路，意外发现新华书店前人群中有外宾……估计是布朗一行。”

鹏喜为小学好友，时在武船工作。从日记标注的天气看，11日当天微雪，布朗在寒冬中来武汉体育馆，体验了一把网球，又下水游泳，兴致不错。

1985年10月10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来武汉，胡耀邦总书记陪同，从机场乘敞篷车抵达武汉体育馆，妻子带着两岁多的儿子从同济医院出来，正好目击这一幕。两岁多的儿子因连打几天吊针，剃了



毛泽东主席与著名建筑学家鲍鼎握手

个光头还贴有橡皮膏药，值勤人员心生怜爱，将他抱到前排看“洋爷爷”。

武汉体育馆坐落硚口区，给了这个工业重镇以格外荣光。近在咫尺的“硚口冠军广场”，源于14位世界冠军从这里走向人生巅峰，尤其是韩爱萍、童辉、周继红、伏明霞、乔红、陈静、李娜、李婷、肖海亮，神话一般创造了连续七届奥运冠军的奇迹——这在全国体育馆中“高光”耀眼。1980年代，荣膺“三连冠”的中国女排到访“冠军摇篮”，一场表演赛的欢呼声浪掀动顶盖。

上中学的第一个暑假，我首次到武汉体育馆室内游泳池，从地下通道去更衣室，一旁玻璃墙突然晃动大腿手臂，这种惊悚一辈子记忆犹新。转眼到了1990年代，“冠军”“奥林匹克”两个露天游泳池对外开放，办了晨练卡带儿子游泳好几个暑假。

从中苏友好宫到友好商场，从武汉饭店到武汉剧院，从新华路体育场到武汉体育馆，从解放公园到青少年宫，全是武汉解放后兴建的“第一座”，同时也全是“第一流”，足见解放大道的不息魅力。



中国女排在武汉体育馆合影



1960年代的解放大道

以中苏友好宫为地标的中心地段，还有广播大楼、建工大楼、地质大楼、邮政大楼、长途汽车客运站、向阳饭店、循礼门饭店、友谊商店栉比鳞次。

漫步解放大道沿线，还会发现一个惊喜：同济医学院、地质学院、机械学院，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现为海军工程大学）、通讯指挥学院（今国防信息大学）、军事经济学院和公安、警官学院等高校云集，不亚于大学城武昌的武珞路。

打开武汉历史长卷，纵览城市变迁玄妙。

1906年，中山大道在汉镇城堡上修建，城市中心首次从汉正街北移。

1954年，解放大道在京汉铁路外拓展，城市中心再度从中山大道北移。

2024年，解放大道高架飞虹、环线相绕，雄峙在沿江大道、中山大道与建设大道、发展大道之间，担当大汉口中轴线，铺展大武汉新画卷。

简桦，本刊编辑

我的民革路与黄埔情

◇ 周丽芳

人物名片：周丽芳，民革党员，曾任民革青山区工委副主委，青山区第五、六、七届政协委员。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1968年高中毕业（老三届）下放湖北汉川当知青。务农两年，1970年被招工至汉川县化肥厂工作。1988年调回武汉，在青山区妇幼保健院工作。1990年，我参加武汉卫校成人医士班学习，考试合格取得执业医师证，在单位从事心电图检查工作，2004年退休。

（一）

我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家族成员中50%都在台湾。儿时的记忆中，伯父、

伯母、叔叔、姑父、姑母在哪里，什么模样，都不知晓。只听大人们说过：“他们都是国民党的人，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从我记事起，命运就将我与国民党、黄埔军校连在一起。在极左路线泛滥时期，因为我家与国民党的渊源关系，父亲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点对象。8岁的我也成了“反革命后代”，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在幼小的心灵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1978年迎来改革开放，党的新时期统战方针温暖了“三胞三属”的心，我的政治生命也迎来了春天。从汉川调回武汉后，我便成了重要的统战对象，统战部及台办领导的关怀让我挺直了脊梁。

1992年至2007年，我光荣地连续担任青山区三届政协委员，认真履行参政议政



参加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纪念演出（前排左一周丽芳）

职能，曾多次被评为“五个一先进个人”。1996年，我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先后担任民革青山区综合支部主委、民革青山区工委副主委，还担任青山区台联会副秘书长。

我热爱民革组织，在那个没有普及电话的年代，我积极配合老主委杨鄂英的工作，如下班后骑自行车给众多党员送会议通知，经常上门看望生病或住院的党员。

党员王灵芳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改革开放后摘掉右派帽子，但工资待遇未能恢复。我得知此情后多方奔走，向青山区人事局、民政局反映情况，并多次沟通联系，商量解决办法。2005年，问题终于得以解决，王灵芳的工资每月增加88元，并一次性补偿6000多元。

（二）

我的伯父周法云，1938年就读于国立武汉大学，时值抗日烽火燃起，他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重庆黄埔军校十六期一总队（简

称16-1），随后奔赴抗日救国战场。他赴台后历任台湾东管区炮兵司令、台北警备司令等职，中将军衔。

伯父一生铭记中山先生的教导：“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因此他念念不忘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目标！

定居台湾的39年，他十分思念家乡，在诗中

写到：“睽违乡园万重山，归期若梦终日盼；往事如烟尘迹渺，两岸亲情声声唤。”这首诗道出了一位黄埔老人思念家乡的迫切心情，由于那段历史鸿沟的阻隔，他只能将这殷殷游子情宣泄于纸上，描述于诗中，却不能踏上回归故里的路途。

早在1980年，伯父就通过在美国读书的儿子与大陆亲人取得联系，一封封家书传递着两岸亲人盼团聚、思统一的血脉亲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伯父在党的新时期统战方针的感召下，看到中国统一的曙光，开始为推进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而呕心沥血的征程。1988年11月，他终于回到阔别39年的故乡——武汉。返台后他把自家的住房以大换小，腾出钱来作路费，连续四年奔走于台湾和大陆之间，主动承担起推进交流、促进统一的重任。

伯父回大陆除了探亲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寻找全国各地的黄埔16-1同学。他说：“两岸隔离40年，在政治层面上难免有疏离现象，可是国人血浓于水，比起公务运作

更能心心相印。”伯父对大陆熟悉而陌生，他希望我能承担起两岸黄埔16-1联络员的重任。我被老人执着奉献的精神所感动，欣然答应了。伯父上北京、奔西安、赴成都、抵兰州，四处联络黄埔同学。

(三)

当时我刚调到青山区妇幼保健院，正忙于学习和工作，伯父到我的单位看望院领导和同事们，受到区委统战部和区卫生局领导的热情接待。他回台后来信致谢，这为我日后请假陪同他开启了“绿灯”。

我请假陪伯父赴成都寻找黄埔16-1同学蒋术亮、张修忠，并邀请成都黄埔同学聚会。我还陪伯父赴兰州和天水，考察天水秦城玉器厂，为投资设厂做准备。

1989年12月是黄埔16-1同学毕业49周年，我协助伯父在汉口的小桃园餐厅举行



协助中央电视台拍摄纪念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纪录片《百年黄埔》（右一周丽芳）

庆祝宴会。我陪伯父参加一次次聚会，倾听他一次次热情洋溢的宣讲。他充满激情地号召两岸黄埔同学为促进祖国统一发扬骆驼精神：“含辛茹苦、鞠躬尽瘁，坚韧奋斗、保持信心，投入诚心、付出耐心。”

伯父这样说了，他也这样做了。为了促进经贸交流，他广泛联系动员商界朋友，来大陆投资设厂。他率商界朋友一行7人来汉考察，洽谈了7个投资项目。为促进文化交流，他邀请武汉杂技团和武汉京剧团赴台交流演出，为此他多次与市委统战部、市台办、省市黄埔同学会的领导接触。

为促成演出成功，他还数次与市文化局及两团领导协商，拟定了文化合作“草约”，并在台湾《环球时报》连续一周刊登宣传广告，在岛内引起轰动，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90年伯父因肝脏肿瘤而住院，出院后赴统一后的德国，



2023年9月11日，为104岁的黄埔老人贺寿



中央电视台《百年黄埔》摄制组在南洋大楼（国民政府旧址）门口拍快闪

交流汲取统一的经验，之后再次回汉与有关人士交流探讨祖国统一话题。1991年他被确诊患肝癌后，置个人身体于不顾，5月13日率团来汉考察，并与两团正式签署“草约”。1991年11月4日，无情的病魔夺走了伯父的生命。

（四）

1991年10月，湖北省政协举行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大会，台湾的黄埔16-1同学席少丹伯伯应邀参加大会，我受命去机场迎接。

席伯伯是贵州人，父亲系辛亥烈士，他几乎每年都要来大陆给父亲扫墓，然后去各地看望黄埔同学。他来武汉次数最多，参加黄埔16-1每年一次的毕业庆典，有时他还资助活动经费。我与他长期书信或电话往来，后来他担任台湾黄埔16-1同学会会长。我曾陪同他去山西临汾寻找黄埔16-1的田

祥才伯伯。2010年8月席伯伯在台湾去世。

黄埔16-1的学生是1938年入学，1940年毕业，校址在成都。从1989年他们开始庆祝毕业49周年，之后几乎每年都是我协助闵文杰伯伯举行毕业庆典，自筹经费。直到2000年闵伯伯去世，便由我与他的女儿闵润琪组织。

从1988年我担任黄埔16-1联络员至2010年，这22年中，我参加接待多位台湾来访的黄埔老人及台湾黄埔16-1参访团，

为两岸的黄埔老人传递信息、组织活动、沟通亲情。

1999年我第一次参加省、市黄埔同学会庆祝建国50周年活动，会上我演唱歌曲，歌颂祖国歌颂党。20多年来我积极参加省、市黄埔同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如：参观学习、参加学习班、参加文艺演出等。我早已融入了“黄埔”这个大家庭，热情为黄埔老人服务、积极参加黄埔活动已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赋予我生命活力，是伯父让我与黄埔结下不解之缘。作为黄埔亲属，我要继承先辈遗志，发扬黄埔精神，为祖国的完全统一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鄂”史悠悠说根由

◇ 邱 风 杨小杰

纵观鄂州历史，自远古至今，除三国时吴王孙权以“武昌”二字取代“鄂”，鄂

字用为地名一度淡出外，其长期用为封国、封邑、政区名，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内涵。屈原在《九章·涉江》

中写道：“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

这一诗句让鄂字声名远播，而中国中部大省湖北，简称为鄂，也足以见得鄂字来历不一般。笔者认为，湖北之“鄂”史，其来源不外乎这样三个：一是由动物图腾演变而来；二是鄂族人南迁所致；三是“鄂渚”为鄂地名之根。



《九章·涉江》

由动物图腾演变而来

追溯鄂史，当然得解读鄂字的原始创意。原始鄂字，是西周金文中的“噩”字。此字的原始创意一直有着许多解读，有的认为由动物鳄鱼图腾演变而来，有的说是古人祭祀时的一种建筑，有的说是古人测天象的物什，等等。

根据我国第一部楷体字典、南朝的《玉篇》收有鳄鱼的专字“鱷”及其简体“鳄”字，结合元代陈孚《邕州》、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鳄鱼“夜吼声如雷”“其声如鼓”介绍，及当代冯天瑜、罗运环等学者关于湖北简称鄂的研究文章，笔者认为：鄂字原始创意为“噩”，是鳄鱼的本字，所从“王”是鳄鱼背面象形符号，四个“口”，意在突出其“舟人甚畏之”的吼叫声，并以鳄鱼吼叫声作为此字的读音，是一个会意字。当噩字充当地名，属于引申义，便成为鄂。

据鄂州市博物馆鄂楚历史文化展厅展

示，早在 28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鄂州一带就有古人类活动踪迹。新石器时代，鄂地先民凭着简陋的石斧石铲，从事农耕及渔猎生活。古时候，鄂州这一地域属扬越地区，所谓扬越，即扬水以东以南由越人统治的地方。古扬水在江汉平原中部，是连结汉水和长江的一条河流（大概是今湖北荆州沿长江以南一带的长江中游地区）。这一带属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草泽繁茂，盛产一种带金黄色背壳的龙状动物，叫扬子鳄。因此，人们也称这一段长江为扬子江。于是，一个以扬子鳄为图腾的部落在江南鄂地产生，这里的先民们把扬子鳄称为龙。

鄂州城区北矗立在长江中有一处古建筑观音阁，有“万里长江第一阁”的美誉，又名龙蟠矶，传说曾有虬龙盘旋其上，积日方去，其实就是鳄鱼栖息其上。此矶长阔数十丈，石势嵯峨，蜿蜒起伏，如卧龙初醒，雄踞波涛。《武昌县志》载：“是矶初连岸，江日徙而南，遂在江中。”由于对鳄鱼（龙）的崇拜，古人将鳄鱼背壳上的花纹，描绘下



“万里长江第一阁”观音阁

来创作了一个象形字，而读音 e 也模仿鳄鱼叫唤声而来，后来逐渐演变成如今的鄂字。

鄂族人南迁所致

鄂字最早与鄂州发生关系，据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载：西周中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乘机扩大地盘，交相征伐，周夷王执政时期，楚君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乃立中子红为鄂王……皆在江（长江）上楚蛮之地。”

熊红的鄂王城究竟在什么地方？《史记》引文不详，因此，一直有争议。结合当时地理分析，先秦两汉时期，江汉地区有两个地方名鄂，一个在现今河南南阳，另一个就是湖北鄂州。而能称“江上楚蛮之地”的，就只能是鄂州一带了。因此，古人对此“鄂”，有东鄂（湖北鄂州）和西鄂（河南南阳）之称。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楚君封鄂王前，先有“伐鄂”，说明在鄂王城之前，鄂州一带就存在以鄂命名的地方。

由此向前延伸。据考证，鄂字最早出现在夏朝时（公元前 2030 年）的山西，系以统治者的姓名定地名。《史记·正义》载：“鄂，地名，在楚之西，后徙楚，今东鄂是也。”夏时鄂地，在今山西省南部的乡宁县，史称“鄂侯故垒”。商朝时，鄂侯一度被商纣王封为朝中“三公”，后因有扩张之图谋，被纣王杀害。鄂侯国一度消失。西周时期，河南南阳地区也有一个鄂侯国，称本地原为媯姓疆国，有人认为是山西乡宁县的鄂侯国灭亡后，余部南迁至此，但未有可靠资料证



鄂王城城址

实。史上将此“鄂”与湖北鄂州的东鄂对比，称之为西鄂。

西鄂在鄂侯驭方时期，十分强盛，周夷王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驭方，还是没有笼络到他的扩张之心。驭方率鄂军一再南侵，很快到达今湖北东南部的鄂州、大冶一带。这里本是扬越的经济中心，也是长江中游南岸最大的居民聚集地。驭方占领后，将此地作为鄂国的陪都，史书所称东鄂，也正是由此而来。

驭方劳师远征，苦心孤诣，他特意避开了汉水以西较强大的楚国中心（今荆山一带），打通了汉水以东的随（今湖北随州市）、枣（今湖北枣阳市）走廊，到达汉水下游，再渡长江、梁子湖，侵占了当时扬越的经济中心——今鄂州市。

驭方征扬越，无非是为开拓领土，掠夺财富，最重要的就是铜矿资源。青铜器是当时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西周统治者进行的掠夺战争，往往以铜为重要战利品。不少铜器铭文有“孚金”“孚吉金”的字样，就是“抢到好铜”的意思。扬越地区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且采掘冶炼技术先进。由此可见，鄂州很早以前就是美丽富饶、技术先进、兵家必争之地。

鄂侯驭方凭着丰富的资源，和扩张的土地，公然喊出“不服周”的口号，引起了周王朝的高度警惕，周夷王开始对鄂侯进行遏制，直到周厉王（周夷王之子）晚期，鄂侯终于被厉王的大军围剿所灭。

其实，在东鄂附近的楚国，也早就对东鄂虎视眈眈。楚国的先祖是祝融氏，楚人最早居住在荆山，族名叫楚，又称荆楚。商朝末期，荆楚出了一个有名的领袖鬻（音同玉）熊，他预见周兴起有望，就投奔周族首领姬昌。鬻熊足智多谋，获得周王器重，称他为鬻子，以后的楚君便以熊为姓。

周夷王七年（公元前879年），楚国国君熊渠开始兴兵进攻庸国（今竹山）、扬越（今长沙与仙桃之间地带），挺进东鄂（鄂州）。此时虽有另一支来自南阳的鄂国之师也在抢夺东鄂，但因周王朝不断削弱其力量，使得熊渠很轻易地占领东鄂。从此，鄂地属楚。熊渠占领东鄂后，将次子熊红封为鄂王，封地在今黄石、咸宁、武昌一带。鄂王城在今黄石大冶金牛镇西贩乡胡彦贵村，该地现已更名为鄂王城村。

据范文澜《西周东周年表》载，鄂王经营东鄂455年，始而为王都，继而为楚国都的陪都，后来又作为鄂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熊渠“至于鄂”，在楚国八百年的历史中意义重大，几至诸侯之盟主。这一时期也是鄂州历史上最早的繁荣时期。

“鄂渚”为鄂地名之根

屈原《九章·涉江》，不仅是他的重要篇章，更是记载他流放江南路线的唯一证据，古今专家无不重视。对其中著名的“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之鄂渚地望的考证，历来是《楚辞》研究的一个热点。

有湖北鄂州说、武汉武昌说、今梁子湖说、湘北说等。从历代对《九章》集注、解诂文献来看，非今湖北鄂州和武汉武昌所在的鄂东南地区莫属。再就一些具体史料来看，隋朝以前，鄂渚多代指今鄂州，如南朝著名诗人谢朓《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钓台临讲阅，樊山开广宴……于役倘有期，鄂渚同游衍。”梁元帝萧绎《玄览赋》：“经钓台而高迈，过鄂渚而西浮。”可见，自屈原吟出“鄂渚”后，使湖北地名鄂字声望远扬，历代诗文也好，民间俗称也好，用鄂渚代称今鄂州市的情况，十分普遍。

三国魏黄初年间，吴王孙权迁都鄂，以鄂县城为都城，取“以武而昌”之义，改名武昌，使鄂州进入又一个繁华时期。

其时，经过黄巾起义的沉重打击，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地方上形成许多割据一方的军阀。孙策就是长江中下游割据势力之一，其地盘即东吴。200年，孙策病亡，年仅18岁的弟弟孙权在谋臣张昭、大将周瑜等辅佐下，逐步巩固了在东吴的统治地位。孙权虽年轻，但雄才大略，将统治中心从远离长江的吴郡，西迁至江边的京口（今江苏镇江），随时准备进攻长江中游。208年，孙权西征，夺取江夏郡（今湖北云梦、汉口一带）。同年，曹操率大军顺江东下，企图剿灭刘备、孙权，一举统一天下。于是，孙、刘联合御曹，赤壁之战曹操大败，孙权乘机将统治中心西移至建业（今江苏南京）。

孙、刘联合战胜曹操后，为争夺荆州等地，矛盾日益尖锐。为方便掌握军情、指挥作战，孙权曾一度设都公安。221年，孙权趁关羽与曹军在樊城大战的机会，夺取荆州。为巩固荆州统治，孙权将都城迁至鄂县。鄂县（包括今湖北鄂州、黄石、大冶、武昌等地）地处长江中游南岸，地



吴王广场的孙权塑像

理位置优越。境外，幕阜山横亘西南，大别山阻隔东北；沿江一线，上有江夏（武汉）的龟、蛇二山封锁江面，下有柴桑（今江西九江）的庐山雄峙江边；县城北濒大江，东南临洋澜湖，西耸西、雷二山，形成天然屏障。境内，樊湖（梁子湖）方圆百里，可操练水军；樊川（长港）蜿蜒 90 里，是入樊湖、出长江的天然航道。

孙权在武昌正式登基，自号吴大帝，迁千家富户、万名工匠来此修筑城池，建设宫殿。设百工百坊，利用鄂地丰富的铜铁资源起冶铸兵，大力发展造船业、农业、渔业等。吴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东吴局势稳定后，孙权将都城返迁建业，委派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孙登留守武昌，并以此为陪都。后来，东吴末帝孙皓又一度迁都武昌。东吴立国 60 年间，孙权、孙皓建都武昌共 10 年。这 60 年是鄂州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在江

夏西黄鹄矶上三百步，隋立鄂州，以诸故名。”开皇三年（583 年），隋文帝改魏晋以来的地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按“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裁撤和并省了部分州县。废武昌郡，将所辖的 3 县合并，仍叫武昌县，范围包括今鄂州市、黄石市及大冶县；同年，废江夏郡，改鄂州为鄂州，

州治所设在江夏（今武汉市武昌区），武昌县隶属鄂州。此后，江夏又兼有武昌、鄂州二名。

1913 年，废武昌府，改武昌府所在地江夏县为武昌县，次年将原武昌县改为鄂城县。武昌一名，最终移至江夏，而武昌改名鄂城，恢复了历史早期的名称。历史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是一个有趣的回顾。

邱风，鄂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鄂州市地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小杰，鄂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干部

从“以梦为马”到“以马为梦”

◇ 马茹菲（口述） 章旷怡（整理）

人物名片：马茹菲，市政协委员，武汉商学院体育学院马术运动管理系主任。

留学回乡 亲历武汉军运会

外公在抗日战争时曾参加过百团大战，在一次激烈战斗后，他身负重伤倒在战壕中，奄奄一息。就在这时，他的战马跑到附近村庄，一边嘶鸣一边奔跑，吸引了许多村民注意。村民们追赶着马，一直追到了战壕边。见村民们不敢再往前走，马儿便纵身一跃跳入深沟之中，大家这才发现里面还躺着一位八路军战士，连忙救起了他。可惜的是马儿跃入深沟后把腿给摔断了，最后只能安乐死，它牺牲自己挽救了外公的性命。

这不是杜撰的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我外公身上的故事。在我决定要深耕马产业时，父母对我讲了这个故事，告诉我家庭与马的渊源。这加持了我对马的信念感，让我相信冥冥之中的缘分指引着我“以马为梦”，找到人生的发展方向。

我的爷爷和外公都是老一代革命干部，解放战争时随部队南下武汉，后来就一直留在武汉工作。我在汉口出生长大，在我心里武汉就是家乡。年少时，我也曾以梦为马、志在四方；在武汉大学读完本科后，又远渡重洋在西班牙、丹麦、德国和比利时四个国家留学。

海外求学的经历，开阔了我的眼界，更令祖国和家乡的概念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真切炙热。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在海外观看北京奥运会时的热泪盈眶，在大使馆与其他留学生共度春节时的心潮澎湃，以及踏上家乡故土时的幸福喜悦。我相信，家乡即是心安处，也是我将为之努力成长、奋斗终身的地方。

我天性喜好尝试、热爱挑战，一直在

探索新领域，希望接触更多的新事物。本科时，我就读的是学校闻名于世的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取得工学学位；硕士时，转为环境管理，有幸获得欧洲委员会奖学金，取得四个国家联合颁发的理学硕士学位；博士时则转向了经济学领域。多样化的专业背景，不仅拓宽了我的视野，更让我在解决问题时能够从多元角度综合思考，为我在跨学科、跨专业领域的深入发展夯实了基础。



武汉商学院承办武汉军运会马术赛事

回国后来到武汉商学院任教，当时体育学院的院长夏云建教授觉得马术专业需要跟国际接轨，我在欧洲的学习背景十分适合，便诚挚地邀请了我。这份意外的邀请，可以说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对当时的我而言，体育产业是全新领域，马术运动在中国还是一项非常年轻、朝气蓬勃的新兴产业，充满未知和挑战，但也意味着发展潜力巨大，未来空间广阔，有非常多值得做的事情。

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夏院长的邀请，找到了愿为之奋斗的事业，开启了人生的全新篇章。工作之后，我深刻认识到马术运动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马产业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多个领域，而我有幸对这些领域都有所涉及，过往经历和知识储备对这项工作都大有裨益。

刚到武汉商学院时，恰逢武汉军运会筹办，我被借调至军运会执委会竞赛部工作。当时工作十分忙碌，需要24小时接收国际军体官员来往信息，与国际军体各项目主管沟通对接，同时紧张编制军运会9万余件、3千余项，涉及53个场馆、38个项目

竞委会的竞赛器材清单，指导38个项目竞赛委员会的竞赛器材准备、配置、运行等。

我很庆幸，学成归国刚开始工作，就遇到一次在实践中锻炼的好机会。在各部门通力合作中，我们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完成了各项任务，为军运会竞赛器材的规范配置提供了依据和标准，成为世界军人运动会竞赛器材的“武汉标准”。

2018年4月，在刘英姿副市长带领下，我有幸作为军运会代表团成员，赴多米尼加出席国际军体第73届代表大会，向全球军体联盟的成员宣传武汉军运会。

这次借调的工作经历，不仅锻炼了能力，打开了眼界，培养了意志和情怀，更重要的是让我感受到体育赛事对一个城市整体建设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城市文化氛围的提升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我能切实感受到在2019年军运会后，武汉整个城市面貌的巨大改变和格局的全新展现。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真正喜欢上了体育，认识到体育产业的价值，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的事业。

讲台执教 培养马术人才

军运会之后我回到学校，担任国际马术学院马术运动管理系主任。早在2008年，在武汉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就开创全国高校马术人才培养的先河，开办了全国首个马术专业方向。育材造士，为国之本，作为系主任，我深感肩负重任。

通过这些年的不懈努力和大家的通力合作，我们成功实现了中国马术人才培养从无到有，从初创到一流的飞跃式发展，创造了马术高等教育领域的多个全国“第一”：开设全国首个马术运动与管理本科专业；获批全国首个马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与中国马术协会共建全国唯一的“国字头”马术学院——“中国马术学院”；制定首个国家马术行业赛事技术标准等重要马产业规划和标准10余项……

现代马产业贯通一、二、三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不少欧美发达国家以马运动赛事为引擎，成为千亿级（美元）马业大国。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马业大国，马文化源远流长，但是长期以来仍以传统马业为主，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其服务现代社会的作用。推动传统马业向现代马产业的转型，是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为此，我们构建并提出“产业援疆、赛事援蒙、教育援藏”计划，充分发挥武汉在马产业、马赛事、马教育领域的特色优势，以马为媒支持新疆、内蒙古、西藏等民族地区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农牧民增收。

马产业大有可为，但也非常辛苦。我们马术专业的学生基本上都长期待在马房里工作，亲近和照顾马匹、给马铲屎、打扫马厩等等，寒暑假的时候还需要留校照看马

匹。可贵的是，同学们都特别热爱这个行业，每年寒暑假留校的名额都需要竞争上岗，春节也有一些同学申请留在学校。很多同学在大一进校时没有接触过马，通过四年培养，毕业的时候已经取得国家中三级骑手等级，获得教练员、技术官员等各类马产业职业资格证书；甚至有学生夺得湖北省马术场地障碍联赛冠军。

2008年，18岁的骑手华天创造历史，成为北京奥运马术项目的中国“独苗”；8年之后的里约奥运会，华天依旧是媒体笔下“最孤独的奥运选手”，但他再次改写历史，获得中国马术骑手在奥运赛场的最好成绩。那时，华天留下了一句话：“有一天我会和更多中国骑手一起参加奥运会。”终于，华天的愿望实现了，在东京奥运会上，他不再是单人独骑，而是以中国马术队队员的身份出征奥运，这是中国马术运动的历史性跨越。

华天每年都会来我校讲马术公开课，和同学们进行交流。这几年他常和我说，感觉到同学们对行业的理解更加深刻，也普遍有了更高的理想和更远的眼光。前几年很多同学的提问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骑马技术的问题，现在同学们的提问更多都是关于中国马术运动未来发展的方向，谈论自己的理想抱负和对产业发展的设想期待。如果中国未来马产业人才都有这样的思想高度，中国马术的光明未来和远大前程可期！

政协发声 复兴武汉马文化

武汉有着百年的赛马情节和深远的赛马文化，曾是中国重要的“赛马之都”。1905年，英国人在汉口兴建了武汉第一个跑马场——西商跑马场，规定只有外国人才

能进入。武汉的民族资本家们对此不服气，自己建造了华商跑马场，专为中国人服务。但是，汇聚四海，兼容并包，才是武汉的内在此特质，因此之后又兴建了万国跑马场，迎四海宾客。当时数家跑马场同时开赛，大批名流富商涌入武汉，场面热闹非凡，“赛马之都”之名不胫而走。

时过境迁，现在很多武汉人都不太熟悉这段历史，这很可惜。所以我希望能够宣传马文化、重振马文化，再现武汉“世界赛马之都”的辉煌。2021年，我当选为市政协委员，这两年我提案的很多内容都是关于如何传承武汉马文化的历史，弘扬契合时代的先进马文化，推动马文化建设。

2023年武汉两会上，我与李军、卢振明、李明委员共同提出《关于全面提升武汉世界赛马之都影响力，推动武汉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提案，为武汉新发展建言：首先，加快创办首届“中华人民共和国马运动会”，奠定武汉全国马运动中心地位；其次，推动国家马兴奋剂检测中心落户武汉，为高水平马术赛事健康发展贡献武汉力量；再次，加快马术人才培养，将武汉建成中国马运动人才培养高地；最后，强化城市马文化氛围，打造品牌赛事，赋能世界赛马之都各项建设。目前，武汉市体育局等相关部门已对提案进行了积极回应。可以说在马产业的发展规划上，武汉已经走在了前面。

关于推动武汉马文化建设，并以此推进城市发展联动，我还有一些其他设想。武汉是“多谷之城”，经开区有“车谷”之称，也有不少马术俱乐部，再加上我们商学院的马术专业，可以将“车水马龙”形成合力，打造经开区的车马文化。车马文化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融合，符合经开区独特人文气质的文化符号，也能体现武汉九州通衢、



参加市长与政协委员协商座谈会建言

江河汇流、包容四海的城市品质。在2024年武汉两会上，我同鲍丽君委员一同提出《关于打造车谷特色“车马”文化名片的建议》提案，建议：打造车谷特色“车马”赛事和文旅品牌；围绕“车马”文化讲好车谷故事；加强“车马”文化宣传推广。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几年的建言献策还是很有价值的。汉口的马场角是之前万国跑马场的旧址，最近获悉江汉区准备在马场角建一个马文化博物馆，以此保护、恢复旧址，保存、传承武汉马文化。这也使我明白，许多事情需要各界别政协委员扛起责任，当仁不让，不断发声、不断推动，才能够实现。

通过这几年的学习和履职，我深感作为政协委员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特别是当我们提出的提案获得反馈，有积极回应，能够落地的时候，成就感和责任感会倍增。借助政协的平台，确能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实现自我价值，进而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推动武汉的整体发展。这是政协委员的初心使命，也是我不懈的追求。

活出生命尊严，爱心助力他人

◇ 熊 菲

人物名片：熊菲，江汉区政协委员，常青街贺家墩社区副主任。曾任中国肢残人协会青工委委员，湖北省肢协委员，现任中国无障碍建设工作督导员。

因为患有先天性的双下肢障碍，从学步起我就体会到了人生的艰难，始终在自卑与自强、苦楚与乐观、承受与超越中前行。是党和政府给予残疾人的关爱，让“残废人”这个称呼尘封于历史。从“残废”到“残疾”，一个字的改动为残疾人的尊严增添了重量，让我们得以拥有展示自我的舞台和施展才华的平台。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大众也用平等、包容的态度对待残疾人，欣赏残疾人的美。感恩于此，我坚定了“活出尊严，爱心助人”的理想信念，努力用自己健全的双手与头脑，抛开杂绪纷扰，做好自己的同时尽力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用爱与善意服务残疾人群体

童年时期我就开始刻苦学习、争取自立，通过自学取得大学学士学位及中级社会工作师、一级评茶员等职称。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气吞山河的事迹，在努力克服身体的局限性后，我一直在基层社区以及残疾人协会工作，已近20年。

我们成立了熊菲助残工作室，为弱势群体公益性帮扶助力。这些年，我用饱满的工作热情、求实创新的举措，在社区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力量，整合各方社会资源，开辟适合残疾人特点的文化和社区活动。

我在社区报上开辟《精彩人生》残疾人专栏，自己写稿，宣传残疾人的政策，介绍残疾人的故事，刊登残疾人的作品；为无腿的残疾人多方奔走，取得周边百余名居民的同意建造签名，争取施工许可证，拆除

公共花坛，在残疾朋友家门口建成免费专用的“爱心车棚”；向中残联写材料反映所在地残疾人文化需求，得到重视与支持，获赠万余元、涉及众多残疾人优秀作家的图书及音像制品；创建“爱心书屋”，为残疾朋友提供读书、谈心的好去处，为残健之间和谐交流创造空间。

与此同时，我也关心着残疾人的生计问题，通过爱心助残行动，积极引导着残疾人朋友走出家门，认知社会，体验快乐。我将轻度残疾人推荐到家政公司培训，考核成功后，从事重度残疾人家庭的生活服务，完成“爱心家政”，邻里守望，互帮互助，让社区残疾人感受到关爱；建立助残志愿者队伍，组织了白衣天使助残出游，百名残疾人走进国家级反恐训练基地、残疾人法律援助、企事业单位以及爱心人士与残疾人的“爱心结对”，向特困残疾人子女捐赠巨额学费等诸多大型助残公益活动，让残疾人感受到生命的精彩。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我所工作的社区在疫情较为严重的汉口火车站附近，在拒绝社区的特殊照顾后，义无反顾地加入到第一批抗疫队伍中全程坚守。我带队肩负起了志愿者管理和为居民购买重症药品的艰巨任务，往来于各个重症药店、医院，排队、配药、买药甚至为病人送医，期间挽救了数十个癌症病人、重症居民的生命。

当时从早到晚都在忙碌，每天只有三到四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身体疲惫不堪，精神却十分的顽强。后来身边的志愿者朋友们和我说，正是我当时那种身先士卒的行动感染了他们，没想到一个走路都困难的残疾人这么拼，于是更多的志愿者都积极投身到战役中。



参加长沙举办的全国轮椅马拉松赛（左一熊菲）

正是凭着对生命的敬爱和对生活的热爱，我一步一个脚印，从一个蹒跚行走的残疾人，成为社区建设先进工作者和党员志愿者。

用责任与担当履行委员职责

今年是我成为政协委员，履行委员职责的第三年，但第一次作为委员出席政协会议的场景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当时的我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区政协赋予我一份光荣的使命，给予我一个参政议政的机会；紧张的是背负新的身份，我深感责任重大，压力也随之而来。我很清楚，成为政协委员不是意味着自己从此功成名就，可以享受荣誉，而是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与担当。

初入政协时，我很忐忑，感到自己见识浅薄，对撰写提案、社情民意更是不知从何处下手。每次在参加小组讨论时总感觉词不达意，把握不了关键和重点。于是我积极向老委员们请教，明白了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政协委员，唯有加强学习，具备较广的知识、较宽的视野、较强的观察能力，再辅以政策理论水平和写作表达能力，才能发现问

题并提出合理建议。

作为社区副主任，长期扎根社区基层，我更能感受到民间疾苦，了解民之所需。在将本职工作与政协委员的身份职责结合后，我将服务社区、造福居民作为自己的使命，重点关注基层治理方面的问题，通过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参加协商议事活动等方式，为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后，我明显感觉到人们因现实压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心理承受力在不断降低，心理状态变得脆弱。特别是残疾人群体，伴随着经济收入减少、家庭负担加重，生理病痛反应增强，焦虑感失落感加剧，社会适应与融合能力减弱，亟需及时调整情绪，重建心理健康。

于是，我针对性地就此现象与居民代表、困难群众直接沟通，提交《关于疫后为残疾人群体提供针对性心理辅导》提案，建议面向全区残疾人群体提供针对性服务，帮助他们重建心理平衡。定期对残疾人家庭开展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针对性心理服务；开通心理援助热线，提供免费线上咨询服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建立家庭康复支援机制，帮助残疾人家庭走出疫情带来的负面阴影。

辖区老旧小区的改造，是一项民生工程，将为居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然而旧改项目中针对楼顶及外墙漏水情况、管网管线老化、外墙老化脱落等问题并未全面完善解决，从而留下安全隐患。同时，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针对无障碍环境建设及设施改造也尚未完全展开。应充分利用旧改的机会，因地制宜加快补齐这些短板和弱项，加快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

这一点在小区治理工作中，我深有体

会，在处理居民多次此类投诉后，我意识到早期老旧小区外墙“老龄化”，贴砖脱落的现象俨然成为隐形的“空中杀手”。同时老旧小区内老年人居多，普遍存在无障碍设施建设水平较低的问题，要在改造过程中注重人文关怀，保障弱势群体生活尊严。

通过细致调研，我提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重点纳入外墙维护及无障碍改造》提案。建议旧改项目中应将外墙维护作为重点纳入，并且成立专业维修施工队伍，每年定期对辖区内建筑物进行安全隐患排查，从源头上杜绝“问题外立面”隐患。同时旧改项目应重视老人、残疾人的生活需求，让他们感到安全、有尊严。

2024年，我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走访调研，提交《关于加强城区出租房屋管理》提案，旨在使辖区内酒店、旅馆、民宿的经营乱象引起社会关注，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规范出租房屋管理，维护房屋租赁双方合法权益，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公共安全。为此我用了大半年时间，从辖区派出所、城管部门、各小区物业公司、业委会以及业主与租客那里了解情况，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研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这个提案得到了区政协的高度重视，区房地局有关人员和我进行了面对面深入研讨。

作为一名政协“新人”，我的提案建议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但我不会灰心气馁，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继续关注社区治理、教育、扶残帮困等方面的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社区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与城市共赴“更新”之旅

◇ 胡江涛（口述） 闻夕（整理）

人物名片：胡江涛，武汉市台州商会常务副会长，中政建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硚口区人大代表，硚口区建筑业协会会长，硚口区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协会会长。

“风可以吹起一大张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

作家冯骥才的这句话，我很喜欢。我是浙江台州临海人，2006年高中毕业开始创业。从临海到武汉，至今18年，一路跌宕起伏，凭着一份坚韧与执着，终于守得云开日出，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在碰壁中成长

高中毕业那年，我拿着母亲资助的1万5千元钱，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创业。创业的项目也是自己的一份爱好——轮滑，当时也没有什么创业的好点子，只想着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临海是全国首个获得“中国宜居城市”称号的县级城市，城依山、山傍水，灵江绕城而过，在我熟悉的家乡创业再好不过。2006年，我创办的临海市飞人轮滑俱乐部正式成立。

轮滑教学一般是白天守店，晚上培训教学，教学点则设在临海市各大广场、公园，以及多所校园内。因为我们的教学认真负责，专业水平高，深受孩子们喜欢，很快就小有名气。然而，好景不长，2008年，半年雨季、几场台风，把行业旺季吹跑了，俱乐部也进入了寒冬，不久后歇业关门。

不甘失败的我，又与朋友合伙经营过室内培训场馆，开过溜冰场，做过淘宝店，开过游戏厅，卖过眼镜，因为不善经营，加之缺乏经验，很快都失败了。一番折腾下，我身上背负几十万元的外债，并陷入深深的迷惘中。

母亲对我说：“自古无奸不商，你的性格太柔了，不适合做老板。”绝望之下，我投奔在温州开制鞋厂的表姐。上了一天班后，整夜无眠，我心中确信这不是我要的生活。于是我又回到台州，去同学的建筑公司打工，从此进入了建筑行业。那一年，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凑钱，帮我还清了欠下的高利贷。那是我人生中最黯淡的两年。

我要自己说了算

同学的建筑公司主要从事维修加固，没多久我被派往舟山分公司，大半年没有接到一个单子。我开始在网上探索设计、营销软件，结合工作实际，发挥自身所能，研发了互联网营销工具，替公司接到了不少网络订单。

早在开淘宝店时，有次需要设计一个



2023年12月29日，武汉市台州商会新春团拜会上，胡江涛（中）担任主持人

海报，文印店的员工告知设计一张需要200元。我咨询了有关软件知识，开始自学，很快熟练掌握。看来在软件开发上，我是有天赋的。

接到订单给了我极大的信心，于是向老板建议：可以一起开个网络公司，既可以接建筑加固工程，也可以接房屋检测鉴定、设计、装修、勘察等项目的订单。

但是老板并不相信我，淡定地对我说：“不是打击你，你一个高中生，又不是专业的，你信不信，我花5000块钱找个专业的软件公司，就能做出一个比你设计好几倍的软件。”这番话让我深受打击，也让我意识到，只有自己当老板才能自己说了算。

在那之后，我开始给自己找合伙人。公司里的每一位同事，身边的每一个朋友，我不厌其烦地私下找他们聊想法聊规划。但是，没人愿意相信一个学历平平且负债累累的失败者。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当年开轮滑俱乐部时培养的一名教练员，他人品很好，后来在杭州卖车赚了钱。经动员，我们一拍即

合，他拿出5万元启动资金，我又开始了重新创业。

勇闯湖北市场

2013年，我瞄准建筑改造市场中建筑工程检测、房屋安全鉴定、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等业务。我同学的业务在浙江，我是他带出来，不能跟他抢生意，便远赴江苏开辟市场。当年就将业务触角辐射至长三角众多省份，这进一步增强了我的创业信心。

第二年，我感觉到时机成熟，重新组建了一个精干团队，贷款买了一辆比亚迪。5个人一台车，来到九省通衢的武汉。我们找了张武汉地图，经比较决定落脚东西湖区吴家山。这里位于主城区边缘而不失繁华，租房相对较便宜，在此注册成立了武汉京翼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当年，我们的业绩就突破百万大关。吴家山的办公地点只能在客厅接待客户，我们就近转至常青花园，租了套别墅，招了一批人。但大半年下来，公司的支出与收入持

平都很吃力。我意识到公司能力匹配不上发展速度，只好裁掉一半员工，回归吴家山出租房。同时，我进行了深入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迅猛，建筑业总产值一度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然而，随着城镇化逐步进入中后期，建筑行业已告别单纯的增量扩张，转向以城市更新为主导的新阶段。

观察国外成熟市场，如欧美地区，更新改造项目在建筑业总产值中占比高达20%至30%。而同期上海等城市更新项目产值仅占3%左右，表明我国城市更新领域有着巨大潜力。

我国城市更新处于起步阶段，前景广阔。我们敏锐捕捉市场变化，2018年重整旗鼓，将武汉京翼改名重组为中政建研集团有限公司，并在跨界与整合上下功夫。

利他中共赢

公司在互联网领域深耕细作，创造性应用“互联网+建筑”的新理念新模式，先后打造出“SEO矩阵”“新媒体矩阵”“蜘蛛万词”“蜘蛛客”等一系列互联网产品。

“SEO矩阵”以其精准的定位和高效的优化策略，助力集团多个网站排名提升，一度同时霸占百度搜索前三的位置，赢取海量流量。“新媒体矩阵”则凭借创新的传播理念和多元化的媒体资源，让信息在互联网的海洋中翻涌。“蜘蛛万词”与“蜘蛛客”更是公司的得力干将，以强大的技术实力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为分院提供了全方位的网络营销服务。



胡江涛参加武汉市硚口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凭借着这些卓越的互联网产品，打破传统的发展瓶颈，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信息的快速流通，使得公司的平台曝光次数过亿，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

同时公司采用与其他主体共同合作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政建研作为平台公司积极寻找具有实力和共同目标的合作伙伴，将运营模式、发展路径、自研软件全盘复制，通过高效的管理和创新的运营模式，实现项目的持续盈利，在利他中实现双赢，并迅速占领各地市场。

另外积极寻求战略性合作开发。在这种模式下，中政建研与其他主体共同注资入股，成立城市更新各细分领域的项目公司。公司负责项目的开发、建造和运营工作，从规划设计到施工管理再到后期的运营管理，都由项目公司全权负责。项目完成后，收益按照双方的入股比例进行分配，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这种合作模式整合了双方的优势资源，确保项目的长期稳定发展。

在强强联合、抱团取暖的经营理念下，公司打造了全产业链，成为城市更新一体化综合服务商，其业务包括城市体检，如房屋安全鉴定、消防安全鉴定、防雷鉴定；城市医生，如设计、维修加固、防水；城市美妆，如工程技术研究、装饰改造、外墙涂装等。

在独具特色的核心竞争力加持下，中政建研建立了以武汉总部为中心，辐射开拓全国 20 多个省市、逾 30 多家分支机构的综合体，5 个人的小团队成长为 300 多人的大集体，综合业绩增长了近乎百倍。

在合作中我坚持以真心换真心，选客户也是这个原则。多年来，我积极参与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向监利县贫困学校捐赠图



中政建研集团党支部重阳节对辖区内高龄老人进行走访慰问

书，资助通山县贫困留守儿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参与抗疫物资运输、积极捐款捐物。公司员工有困难，我不遗余力伸出手，有位员工借了高利贷，知道后我立马帮他把钱还上。自己淋过雨，所以希望给别人撑伞。这可能是我能走到如今的原因吧。

在公司员工培训时我常常说一句话：

“20 岁时，有人愿意带你；30 岁时，有人愿意用你；40 岁时，有人愿意抬你；50 岁时，有人愿意跟着你；60 岁时，有人愿意俯下身请你。这才叫成功！”我相信人品是最好的风水，善良里一定藏着福气。

城市建设侧重于做增量，城市改造侧重于存量，而城市更新侧重于质量，这三块是不可分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如何真正实现与建筑业共生共荣，我将不断更新自我，带领中政建研开拓创新，用更新促繁荣，用更新提品质，为中国建筑工程安全事业保驾护航。

涂治，从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走来

◇ 裴高才 杜春华

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前夕，笔者一行前往新疆大地，伫立在涂治教授塑像前，缅怀

新疆首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追思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的黄陂先贤。



周恩来（右）与涂治（左）话别

1949 年 9 月，涂治作为特邀代表飞抵北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会议期间，涂治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会后，周恩来为新疆代表团送行，并与涂治亲切话别，留下了永远的瞬间。

涂治，著名农业科学家、植物病

理学家、教育家，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1929年获博士学位从美国归来，1939年到新疆学院任教，毕生为新疆的解放与发展呕心沥血。

75年过去，涂治的身影从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走来。

改名涂治，励精图治为报国

涂氏家族是湖北黄陂望族，清末民初走出了翰林、驻外大使和两位院士，涂治就是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之一。

涂治（1901—1976）原名涂允治，字策三，1901年10月2日出生于黄陂涂家大湾一个书香人家。祖父涂道咏是清朝秀才，先教私塾，后倡新学，创办黄陂私立木兰女子小学并任校长。



1930年，涂治在广州岭南大学

涂允治5岁由私塾先生启蒙，7岁考入新式学堂——黄陂望鲁高等小学堂。1916年8月毕业后，考入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半公费生。1924年6月，在获得生物系理学学士学位的同时考取公费留学生，与同班同学周培源一行漂洋过海远赴美国。由于学习刻苦，聪颖过人，学业成绩总是名列第一，导师常常投以赞赏的目光。经过5年拼搏，荣膺明尼苏达大学植物病理学和作物育种学博士学位。

涂允治回国后，为科技报国而改名为“涂治”，谐音“图治”以“励精图治”。1929年8月，受聘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1932年，转任河南农学院教授、院长。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疾苦，接触生产实际，指导农民选用良种、防病除害、精耕细作，力争有个好收成。此间，他

与中共地下党员乐天宇交往甚密，同时开始自修俄文，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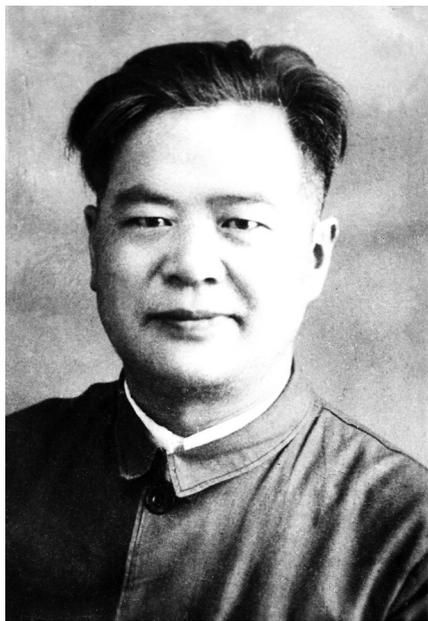
1934年初，涂治应武汉大学之邀，协助筹建农学院兼办湖北棉业试验场。然而，走入武汉大学才发现此处并非净土，更有军阀操纵，棉业试验场又受资本家控制。

1935年，涂治苦于无力改变现状，从武汉大学来到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出任农艺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呕心沥血培养了大批农业科学人才，我国一些著名科学家如王鸣岐（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植物病理学家）、赵洪璋（西北农学院教授，小麦育种专家）等，都出自他的门下。

在此期间，涂治与乐天宇联系密切。乐天宇在陕西农校从事地下工作，每到西北农专都要与他倾心畅谈，介绍党的方针政策和延安新气象，使之受到启迪和鼓舞。

抗战爆发后，涂治积极组织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会同教授薛愚等人，支持地下党员李道煊发起支援八路军抗战的革命活动，鼓励进步学生投奔延安，杨捷、吴鉴群等相继参加八路军。不少青年慕名来访，他都热情接待。有的青年去延安，他赠送棉衣并亲自送行。他的住处，成为许多青年进入延安的中转站。由此，学校当局免去了他的教务长职务。

1938年1月，西北农专与北平大学农学院合并，更名为西北农学院，进步活动的声势越来越大，一小撮反动分子乘机混入，扰乱正常教学工作，学院一时陷入混乱。涂治愤然辞去农学系主任职务，只任教授和实验室农场主任，并住到农场去。乐天宇看到他的苦闷，约他一同投奔延安，拟于深秋动身。



1939年，涂治任教新疆学院

飞越天山，新疆学院传薪火

1938年11月，涂治接到救国会负责人之一、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的聘书，聘他去筹建新疆大学农学院。杜重远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发表不少进步文章，其《三渡天山》使涂治向往新疆。鉴于有不少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在新疆工作，乐天宇支持涂治去新疆学院。

涂治路过兰州，邀请留美同学、畜牧专家周云荅一道赴疆，他的行李中7个大木箱全是书籍。他们搭乘苏联车队的一辆卡车，风雨兼程两个多月，1939年4月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

涂治先后任新疆高级农业学校教务长、新疆学院农科主任等职，并继共产党员林基路、郭慎先（郭春则）之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为改变迪化的生态环境面貌，他带学生到西郊公园植树；为学习机器操作，他领学生到机械修理厂向工人学习；为实习运用各种农业机具，他和学生翻山越岭徒步一天到谢沟农场种地。多年后，大家仍然记得他在田间驾驶拖拉机和扶犁吆马的动人情景。

那时，不少学生家庭贫困，涂治的薪金除伙食费和买书外，其余用来接济贫困学生。回族学生尕文祥出生煤矿工人家庭，父母又先后病故，面临辍学之困。涂治用他的薪金支付尕文祥的伙食费和学费，还每周两个晚上专门给他补课，使之一连三学期名列第一，直至享受公费待遇。

涂治在与林基路、毛泽民、郭慎先等人的接触中，一面大量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一面收录新华社电讯广播编印传单，揭露一小撮民族败类分裂祖国的阴谋。

走出监狱，奔走和平求解放

1942年，在德军进逼莫斯科的紧急关头，新疆军阀盛世才撕下伪装，公开反苏反共。一时间，乌云笼罩天山，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迫害。涂治痛心疾首，在新疆学院红楼小礼堂作时事报告分析国际局势，指出德国法西斯必败，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1944年5月4日，反动军阀诬蔑涂治是什么“天山共和国宣传部长”、企图在共产党策动下阴谋暴动，将他逮捕下狱。

说起来十分可笑，涂治曾以英语“book”译音“波克”作为笔名，反动当局竟一口咬定说“波克”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缩写。特务严刑逼供，要他招供与陈潭秋、毛泽民等人的关系，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以至腿部严重受伤落下残疾。

盛世才垮台后，警务处长又试图引诱涂治就范：“只要涂先生写个申请，加入国民党，立刻就释放你，恢复你的工作。”涂治冷静回答：“我是教授，从来对党派不感兴趣。”

1945年3月，在地下党和各界人士的全力营救下，涂治等几位专家才被保释出狱，不久任建设厅农业顾问兼血清制造厂副厂长。考虑当局仍在企图加害涂治，地下党与苏联政府及时联系，特邀他以参加中亚国立大学建校25周年纪念大会的名义，赴塔什干讲学，得以脱离虎口。

次年5月，涂治回国出任新疆学院副院长。国民党文化特务头子王耘庄兼任学院文史系主任，图谋篡夺学院领导权。涂治发动进步师生揭露其种种罪行，将他驱逐出校。

涂治领导地下进步组织“战斗社”负

责人禹占林及其团队，秘密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从1946年到1949年9月，他几乎每天夜间收录延安广播电台节目，次日清晨把收录稿交给战斗社在《战斗》周刊登载，或印成传单散发全疆。

1949年下半年，王震将军挥师进疆。涂治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周旋于国民党和各民族上层人物之间，为新疆和平解放而奔走。

8月，涂治秘密飞往伊宁，向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介绍情况，他撰写的《迪化最近政治动向》《迪化方面财政经济情况》通过“力群电台”报告党中央，为推进新疆和平解放提供了参考。随后，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详细询问新疆各方面情况后说：“你与新疆各族人民合作得很好，回去后要更好地与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新新疆作出更大贡献。”

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10月，涂治荣获西北野战军颁发的“毛泽东奖章”和“人民功臣勋章”。年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成立，任命涂治为人民委员会委员兼农林厅厅长，经王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常陪同王震到新疆各地视察，共谋屯垦戍边大计，生产兵团的不少垦区就是他们一起确定的。十几年后，王震笑对涂治说：“我现在才完全懂得了在新疆开垦农田首先必须造好防护林的意义，这一点是你涂先生教我的啊！”

部队屯垦需要农林科学技术，涂治把农林技术干部组成几个随军工作队，协助部队生产。军区举办农业生产训练班，他积极配备教师，亲自指导教学工作。部队缺乏经营管理经验，他翻译国外有关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的书籍送去参考。

培育人才，创办八一农学院

为解决新疆农业科技人才缺乏问题，涂治向王震建议创办一所高等农业学校。1952年，中央批准新疆军区筹建八一农学院（1995年更名为新疆农业大学）。涂治随王震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请来王桂五、张景华、张学祖、朱懋顺、黄大文、王志培等16名专家学者任教。4月7日，王震任命涂治为八一农学院第一任院长。

1952年5月初，教师、学员陆续来到老满城，投入紧张的建校劳动。面对一处年久失修的旧军营，师生自己动手翻修，将其改建成教室、宿舍、食堂。同时，植树开路，修建温室，开辟试验田。

1952年8月1日，八一农学院如期开学。开学典礼上，涂治讲话说，老满城在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建成时，乾隆皇帝亲自命名为“巩宁城”，取意“巩固安定”，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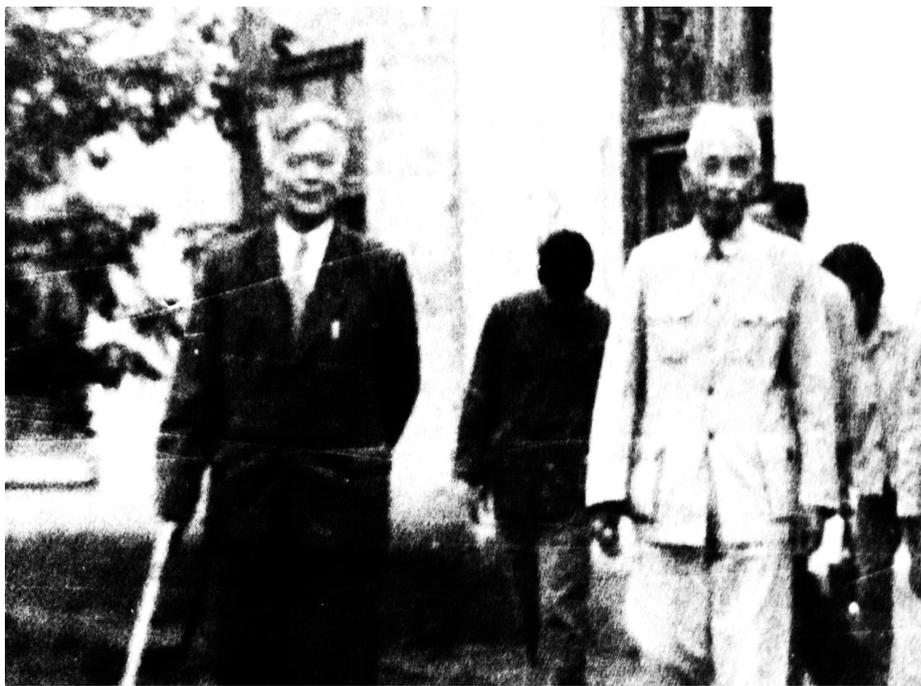
毁于战火。抗日战争时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立师范学校在旧城废墟上建立了一座崭新的校舍，可是1943年被国民党军队霸占。今天，王震将军率领我们在此重建高等学校，以农业学科为优势，以自然科学为主要学科领域，以应用学科为主要发展方向，以本科教育为主要办学层次，为这座古城插上科技的翅膀，让老满城变成人民的“满意之城”。

涂治经常带领师生深入建设兵团，一起研究科学耕作技术，在玛纳斯河流域开展闻名全国的大面积棉花生产。他还帮助部队规划农田、营造田林，为军垦农场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培养了大批农业技术骨干，同时也丰富了教学内容，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的结合。王震每次到学校讲话，都以“抗大”精神激励师生，赞扬涂治的品德才能，号召大家向院长学习。

为协作推进农业机械化试验和棉田化综合作业试验，涂治深入到北疆检查指导。在阿拉尔垦区，他看到黄大文教授利用赤眼

卵蜂防治棉铃虫效果达80%以上，充分肯定“生物防治大有可为”，大力支持这一研究深入推广。

1953年5月，涂治在牧场试验地仔细观察朱懋顺教授从华东引种的81种牧草的生长情况赞扬说：“种植牧草特别是豆科牧草，不仅是发展畜牧业的物资基础，也是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的重要环节。”他知



涂治（左）陪同王震（右）视察八一农学院



涂治（中）考察新疆棉花试验田

道朱教授不大习惯新疆生活，语重心长对他说：“希望你和你带来的牧草一样，扎根新疆。”尔后，他还陆续送去自己写的文章和译作，朱教授深为感动，增强了在边疆从事牧草工作的信心。朱教授后来回忆此事时赋诗一首：“相逢在田畴，引物论远谋。确信新疆好，扎根出土后。”

科技兴疆，踏遍全疆人未老

1955年6月，涂治入选中国科学院生物地理学部委员（即院士）。次年，他兼任新疆科协筹备委员会主任，以科普展览、学术讲座、技术服务为载体，走遍全疆13个地州。

1960年4月，涂治当选新疆科协主席。他依托群团优势，邀请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综合考察、科学试验。他以所属学会为主体，组成7个专业基点工作组分赴南北，开展小麦倒伏、玉米空干、陆地棉蕾脱落等专项研究，取得可喜成果。

涂治得知植病教研室正在研究原真菌，挤出时间参加研讨会，强调“首先把白粉菌、锈菌、黑粉菌搞清楚”。他还把自己在美国求学时用过的名著《植物病原真菌》送给研究人员，写信推荐他们向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所长、世界著名真菌学家戴芳澜教授请教，为这一研究指明了途径。他满腔热情支持建立原子能利

用机构，利用放射性元素处理种子，培育作物新品种。

1964年秋，涂治赴苏联吉尔吉斯斯坦考察无籽西瓜，获得一粒瓜籽，回国后科学培育成功，从此无籽西瓜在新疆大面积栽种。

1973年，涂治邀请60余名草原科技工作者在农科院座谈，人称“新疆第一次草原界聚会”。

涂治兼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新疆农业科学院院长、自治区科委副主任等20多个社会职务，工作繁重，但始终保持学者本色。在发表众多论文之外，他翻译出版英、俄、德、法《植物阶段发育》《牧草田轮作制》等专著，是把农林牧三结合的“牧草田轮作制”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他创办《新疆农业科学》杂志并任主编，对每一篇稿件都认真修改，有的还请专家学者审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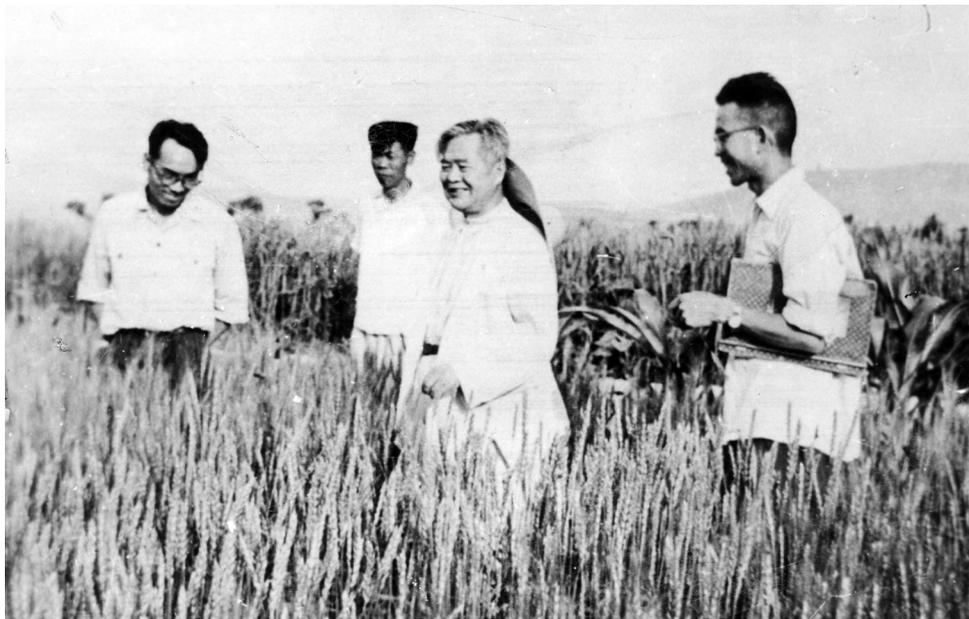
在学术问题上，涂治一贯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1950年代，科学界发生遗传学两派之争，有些人只讲米丘林

学说，任意批判摩尔根学说，还给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涂治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严肃批评这种作风，告诫大家“对学术问题的争议，不能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去解决，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是谁非，只有用科学实验来证明。”为此，他特邀浙江农业大学沈学年教授讲摩尔根遗传学，深受教师欢迎。

1958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的误导下，新疆农科所有些人跟风放“卫星”，播了几百斤麦种，扬言要创造亩产万斤的新纪录。对此，涂治与八一农学院农学系的教师和部分科技人员一起，特在“卫星田”旁种下8亩“常规田”。收割后核产，“卫星田”连播种量的一半都没收回，而“常规田”却亩产高达600斤。此事不仅当时令人心悦诚服，至今仍传为佳话。

这就是涂治，承载着现实的压力，不盲目“赶浪头”，用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向世人证明科学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涂治还致力于科技人员的政策落实，发挥颇具学科特长专家的作用。



涂治（中）在田间调研

王恒升是留学瑞士的地质学家，曾任西北地质局总工程师，因历史问题判刑，经涂治劝说王震请示周总理批准重返岗位。后来，王恒升为勘查开发乌鲁木齐六道湾煤矿做出贡献。王震深有感受：在地面上能确定地下是个大煤矿，这就是科学家的本领，释放王恒升做得对，受到周总理的表扬，这是涂治的功劳。

死而后已，承担重任到终点

涂治步入老年后身体不好，新疆自治区党委通知农科院，只安排半天工作，可他照样全天工作，甚至晚上和星期天也加班。

一些朋友劝涂治说：“你精通英、俄、德、法四国语言，年岁又这么大了，不如到北京做点翻译工作，或者坐下来著书立说也行。”他回答说：“我要为党再干10年，以后坐下来写点东西也不迟。”

1975年春，新疆冬小麦出现大面积冻害。涂治正在病重之中，仍以惊人的毅力行程千里，到各灾区调查研究，搜集一手资料，提出四项措施，收到显著成效。

这时候，10个省、自治区农田防护林现场会在喀什召开，涂治抱病率领科技人员前往，与各地同行分享研究成果。会议结束，工作人员给他买机票返回乌鲁木齐



1970年代，涂治在书房

齐，他坚持和大家一起坐汽车，沿途检查各试验站的工作。

全国四届人大召开之后，农业部要求新疆主持制定“探索适应我国大生产农牧结合和高度机械化水平的耕作制度”，涂治欣然担任这一重任的主持人，夜以继日拼命工作。可由于积劳成疾，身体每况愈下，一次开会时突然小便失禁，没过几天又在上班途中突然腹痛难忍大汗淋漓。送进医院检查，医生诊断“病情很重，立即住院治疗”，他一听就急了：“不行不行，我的工作刚刚摸索到一点头绪……”

1976年3月26日，涂治开始呼吸困难，医院决定立即动手术。然而，手术没能挽救他的生命，四天后走完最后旅程，享年75岁。

涂治虽然远行，但他为“科技兴疆”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天山南北广受称道。新疆农业大学为老校长竖立塑像，成立了同他名字谐音的“图志班”，传承他“科技兴疆”的奉献精神。

王震将军评价说：“涂治教授是我的好朋友，他很有学问，在农业生产上总是



涂治与幼子涂光一全家

他出主意，我下决心组织实施，我们配合得很好！”

有这样一副挽联，表达了人们对涂治的深切缅怀：

想科学救国，周游鄂豫秦新粤，师俄共友人杰，坚信马列縲继之劫，肋断手破求解放，战斗不懈；

持学术争鸣，博采丘林摩尔根，以丰产比卫星，独顶逆风忠诚教育，尽职农林为人民，贡献终身。

（本文历史图片由涂治之孙涂振东提供）

裴高才，黄陂区委统战部原调研员；
杜春华，黄陂区政协常委、民盟黄陂区工委副主委

刘绪贻，在珞珈山上迎接黎明

◇ 胡 耀 尹加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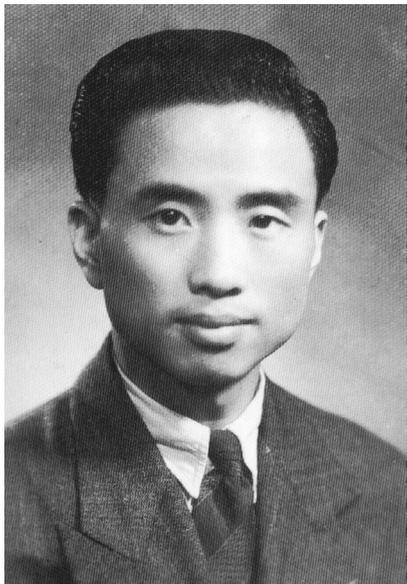
刘绪贻是从武汉黄陂走出的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47年开始在武汉大学任教，解放前夕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为“长江中部之最高学府”武大完整地回到人民怀抱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从清华园到芝加哥大学

刘绪贻1913年5月13日出生于黄陂塔耳乡罗家冲一个薄有田产的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跟随在私塾和小学任教的父亲读书，后相继就读于湖北省立汉阳第十二

中学、省立武昌高级中学、南京军需学校，1936年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生，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获社会学学士学位。在陪都重庆短暂工作后，1943年通过赴美自费留学考试，翌年前往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

刘绪贻青年时期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有志于学术研究，对政治不感兴趣。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刘绪贻受到“刚毅坚卓”精神的熏陶，满怀读书救国的理想，在陈达、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知名学者的引领下，初步寻觅到进入学术殿堂的门径。大学毕业后，刘绪贻为与在重庆工作的女友结婚



1940年，刘绪贻从西南联大毕业

团聚，暂时放弃了学术研究工作，进入国民政府经济部、社会部等部门工作。工作期间，刘绪贻耳闻目睹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朽，曾愤然匿名投书《大公报》揭发身边贪污现象，但举报信被转交到其上级手中，他的字迹被认出，受到排挤，于是希望通过留学深造离开官场回到学术界。

芝加哥大学留学岁月是刘绪贻思想转变的重要节点。他清楚地意识到，在国民党政权的黑暗统治下，中国是不可能走向现代化的，但对共产党仍缺乏直接了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俄文的美籍犹太人马尔科姆·柏森，曾赴中国解放区从事救济工作。两人相识成为好友后，柏森经常将共产党人的革命书籍和报刊带给刘绪贻阅读，并分享自己在解放区的见闻。

1950年夏，刘绪贻在接受采访时回顾了自己寻找真理的心路历程：“在学生时代，我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我很喜欢读书，看过很多哲学书籍，想从知识里找到一条人生的出路。可是，那些书里各家各派自成一说，我越读越糊涂，感觉世界上

没有真理，我自己也没有出路……我有一位美国朋友，他很同情中国共产党，非常轻视蒋介石，他给了我毛主席的一些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之类的书看，此外，他还给了我《四大家族》（注：即《中国四大家族》）。从这些书里，我认识了四大家族的真面目和当时社会腐化的情形。看完一些毛主席的著作，我才晓得读了几十年书，在大学里还是专门研究的社会学，可是，对于中国究竟是怎样一个社会，始终都没有弄清楚，经过毛主席透彻的分析，我才恍然大悟，从这里我才找到了真理。”

1947年6月，刘绪贻硕士毕业，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到依旧动荡不安的祖国。此时，他已相信独裁腐败的蒋介石政权是不可能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唯一有能力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珞珈山上的进步教授

1947年10月，刘绪贻任武汉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讲授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他最初和一群单身教授住在珞珈山麓半山庐，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们为“baby professors”。

刘绪贻认为，为了尽快建立一个新中国，就不能完全遵循国民政府的规章制度来进行教学工作。他摘译美国自由主义学者的著作作为教材，并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的著作《社会学大纲》指定为学生必读参考书，列入考试内容。此外，他还借鉴苏联学校流行的“习明纳尔”（Seminar，即课堂讨论）教学法，受到学生欢迎。1949年初，汉口《大刚报》就刊登了刘绪贻推行

教学改革的新闻：“新社会即将来临，传统的填鸭式的教育当然也会遭时代所淘汰。为此之故，法学院青年教授刘绪贻决首先改变教法，闻其所讲授的文化人类学一科，准备采取集体讨论方式，即先要同学于阅读教本后，提出若干问题，再按照问题的性质列举大纲，然后依照大纲分题讨论，经大家踊跃发表意见后，再由教授先生下评论及纠正若干偏向。此种方法在本校事属创举，该系同学大感兴趣。”

同时，刘绪贻发奋写作，在《观察》《益世报》《时与文》《大学评论》等报刊发表多篇文章，主要从导致国民党腐朽统治的较深层次的思想文化角度讨论问题，而且为了避免暴露，文字也较委婉。2000年，刘绪贻将这23篇文章结集为《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在武汉出版社出版。



1948年，刘绪贻与家人在武汉

他在该书序言中表示：“1948年我写这些文章时，政治上早已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愿意跟着共产党走。但在学术思想上，我还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是较彻底的，而在中学、清华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受长期教育，则使我未能完全摆脱它对我的思想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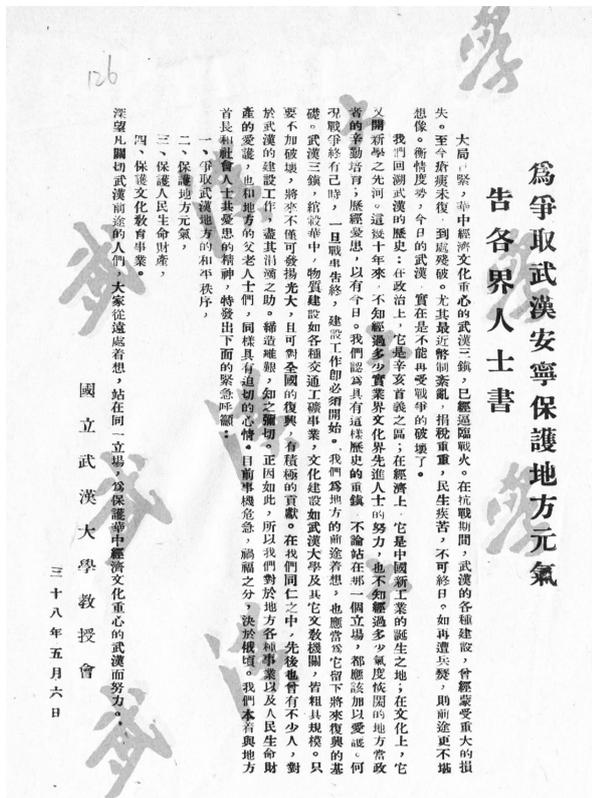
武大左派人士在1949年初的一份调查材料中，曾这样评价刘绪贻：“崇拜欧美民主，自由主义者，常在《观察》上发表文章，储安平的学生，读书用心，虚心追求进步，对樊弘、吴晗印象很好，是比较进步人物。”调查材料的描绘和刘绪贻的自我评价是吻合的。在学生日益倾向革命而教师左派力量不足的武大，刘绪贻已经是相当引人注目的青年学者。

出任新教协教授支部书记

1948年暑假，武大全体教师中唯一的中共党员、工学院讲师蔡心耜，奉武汉地下市委之命，借打桥牌的名义和刘绪贻进行初步接触。1949年初，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江浩然决定在武大教师中建立武汉地下市委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简称“新教协”）。

新教协下设教授支部、讲师助教支部。教授支部由蔡心耜领导，刘绪贻任支部书记，在解放前共发展教授、副教授会员13人，包括韩德培、唐长孺、张培刚、张瑞瑾、孙祥钟、曹绍濂、吴廷璆、梁园东、谭崇台、陈家芷、刘涤源、石峻。教授支部下分三组，由刘绪贻、吴廷璆、梁园东任支部委员。

新教协教授支部开展的活动主要包括：



《为争取武汉安宁保护地方元气告各界人士书》

一、组织会员秘密学习文件。这些文件由江浩然带来，先向教授支部委员传达，再分别向三个小组传达。文件有《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公报》《解放区的工业政策》《将革命进行到底》和新教协章程等等。江浩然还在刘绪贻家中作些讲解说明。

二、广泛宣传新民主主义。新教协组织过不少以宣传新民主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报告会、讨论会，每次规模不等，少则只有教师 20 余人，多则有师生数百人参与。1949 年 4 月开始，经济系连续举办主题为“中国计划经济”的 10 场学术讲座，每周六在法学院教室公开讲演两个小时，实际内容是讲解新民主主义经济。演讲人有新教协教授支部会员，也有其他教授。如刘绪贻讲《生产关系的改变》，张培刚讲《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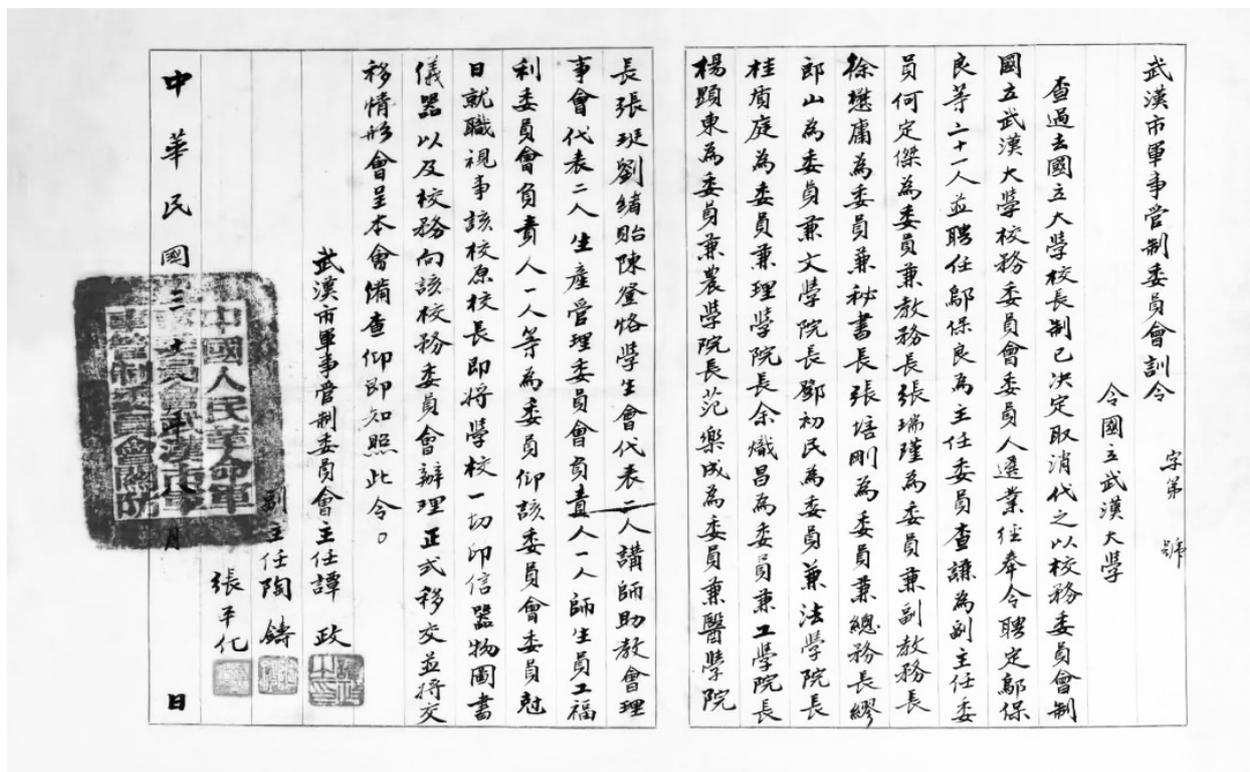
工商管理政策》，李崇淮讲《银行制度与金融政策》。刘绪贻还在江浩然鼓励下，渡江到武汉邮政工会讲课，介绍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听众极为踊跃。

三、参加进步学生的活动。根据地下组织的秘密工作原则，新教协当时并未与武大学生地下外围组织取得联系，但鼓励会员参加进步学生举办的各类时局讨论会、理论问题座谈会。例如，1949 年 3 月 22 日晚，刘绪贻与武大校长周鲠生等人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教育问题座谈会”，讨论今后教育工作者的态度和道路。

四、秘密开展调查研究。武汉地下市委在 1949 年 2 月 23 日指出：“接管工作中的主要一环则是调查研究。这不仅是决定今天政策的基础，而且决定明天城市管理工作的成功与失败。”4 月 19 日，又针对当时工作中不足之处提出“为保护与接管而调研”的若干要求。新教协开展的调查研究分为人和物两个方面。人的方面，是对学校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进行调查，着重分析学校当局的历史和派系关系；物的方面，是清理登记学校的财产和物资情况。调查材料通过组织交给地下市委。解放后，军代表看到这些材料，很快就掌握了武大的基本情况。

五、改组教授会。武大教授会在政治上一般持中间立场，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1949 年三四月间，新教协教授支部会员在教授、副教授中做思想工作，成功改组了教授会，由刘绪贻担任教授会主席。

因为地下工作的性质，新教协的原始档案不易保存下来，但目前仍能看到两份珍贵的宣言材料。1949 年 4 月 1 日，在南京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与共产党谈判之际，南京学生 6000 余人游行请愿，要求国民党接受八项条件，实现真和平。国



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令武汉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的训令

民党军警袭击游行队伍，当场打死2人，打伤106人。4月10日，武大82位教授、讲师、助教联名签署对“四一惨案”声明书：

“全国同胞公鉴：在四月一日和谈代表北飞的时候，南京有许多学生又在特务的刀棒之下牺牲了，这充分暴露了反动者和谈的假面具。同人等以教育工作者的立场，悲愤之余，一面要求政府表示谋和诚意，立即惩办‘四一’凶手及幕后指使人，一面表示严重的抗议。”82人中，包括刘绪貽等新教协教授支部全体会员，可知声明书极有可能与新教协的组织发动有关。82人联署是解放战争时期武大教员的罕见之举，并且包括生物系主任张珽、哲学系主任洪谦等甚少公开发表政治意见者，新教协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为阻止国民党败退前对武汉实施破坏，武汉地下市委广泛发动上层团体、社会名流

争取白崇禧和平撤出，江浩然布置武大新教协教授支部开展工作。刘绪貽以教授会名义起草了一份《为争取武汉安宁保护地方元气告各界人士书》，5月6日在全市散发，提出四点紧急呼吁：一、争取武汉地方的和平秩序；二、保护地方元气；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四、保护文化教育事业。同时，号召“凡关切武汉前途的人们，大家从远处着想，站在同一立场，为保护华中经济文化重心的武汉而努力”。因武大教授会的社会威望，《大公报》《大刚报》等媒体全文刊登了这份文件，造成一定舆论反响，为武汉完整地保存下来，做出了历史贡献。

协助军代表接管武大

1949年5月15日，人民解放军向武汉市区进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张轸

率部起义，白崇禧乘专机仓皇南飞长沙。16日，汉口解放。17日，汉阳、武昌解放，武大全体学生赴武昌阅马场及汉阳门欢迎渡江而来的解放军。6月10日，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部长潘梓年率军代表朱凡与6名联络员正式接管武大。

朱凡到武大后即到刘绪贻家访谈，并让刘绪贻出席有关接管工作的党的会议，令刘绪贻深感党组织的亲切。为支持配合军代表完成接管工作，武大教职员和学生代表成立了协助接管委员会，刘绪贻担任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大致开展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协助军代表掌握武大人事情况；二是协助军代表了解武大经济、校产等情况；三是组织教职工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方针政策；四是协助军代表做好校园安全和教职工生活保障。

8月1日，周恩来同志对武大改造问题作出批示，要求“扶助校中进步分子及学生，以逐渐打破原来武大的旧系统，而达到改造目的”。8月，武汉军管会令武大取消原校长制，成立由21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其中，邬保良为主任委员，徐懋庸为委员兼秘书长，刘绪贻为委员。在徐懋庸到校之前，刘绪贻曾代理秘书长一职。8月25日，武大校务委员会在大礼堂举行成立典礼，这标志着学校的教育性质已发生革命性改变。

1950年，刘绪贻暂时离开武大，任武



晚年刘绪贻（冯天瑜绘）

汉市教育工作者工会副主席。1953年任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调任湖北省高等教育厅教学处副处长。

1964年，刘绪贻重返珞珈山，组建国内高校中最早的两个美国史研究室之一——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从此，长期在武大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成为学界公认的研究美国现代史、战后美国史和罗斯福“新政”的学术权威。

2018年11月10日，刘绪贻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病逝，享年106岁。

胡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尹加加，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历史教师

武昌起义后的鄂军将领季雨霖

◇ 魏德勋 黄 婧

季雨霖（1881—1918），字良轩，湖北荆门人。毕业于湖北将弁学堂，投身湖北新军。忧心国难，矢志革命，为日知会创始人之一，因丙午之狱被捕。保释出狱后，奔走于河北、四川、辽宁、黑龙江等省，从事

革命活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回鄂任军政府顾问，曾赴汉口督战。1911年和1917年先后两次参加北伐，历尽艰辛，为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事业做出了贡献，《民权报》称其为“固革命提倡之先锋，民国创造之伟人”。



季雨霖像

招讨安、襄、郧、荆

1911年11月，季雨霖率部从武昌沿襄河出发，23日抵达仙桃镇，沿途民众欢欣鼓舞。季雨霖发布都督告示，集中溃散兵士，以示招揽。行军之初，季雨霖部数量既少，装备也差。在仙桃镇，季雨霖主要收编了三支队伍。一是京山刘英部。刘英与杨玉如在京山起义成功，率数千人与季雨霖相会于仙桃镇，后归属季部；二是汉阳知府李亚东弃走汉阳，在汉川、仙桃镇集合数百兵士，

在张难先劝说下归并；三是梁钟汉光复汉川后，也率部来投。季雨霖兵力渐厚。

据仙桃时，季雨霖接宜昌民军总司令唐牺支电，约攻荆州。季雨霖派随行官佐阙龙向军政府调请炮队。12月5日，季雨霖部由岳口出发，星夜行驶，次日抵沙洋，派人发布告示，安慰官绅，大意云：此次倡议惟推倒清政府，不准私杀逃亡旗民，不准劫掠财物，保障地方军民生命财产。因枣阳、宜城、京山、潜江土匪猖獗，又命人带队剿匪。10日，季雨霖以赴襄顾问官施化龙为临时指挥官，率一营驻襄，一营赴荆州，并致书荆州将军，劝告其审时度势，缴械投诚，以保障旗民。

满官恒龄闻革命军将至，四面楚歌，惊惧自杀。在革命军招抚分化下，荆州将军与旗兵请降。民军代表、清军副都统松鹤与天主堂马修德神父拟定旗民归顺条约：

（一）缴军械军火及一切关系之军用物品。

（二）荆州城内旗民，均需遵守军政府法律。

（三）驻防原有公田公产，一律没收。

（四）旗民生命财产本部一律保护。

（五）旗民最贫困者，发给恩饷六月。

（六）各种学堂，旗民亦准投考。

旗军缴械投降。季雨霖一面派陈雨苍、邢子文面谒都督告捷；一面计划北上钟祥、襄阳。途经安陆，季雨霖击杀叛将全明汉，平定安陆叛乱，收归张楚材的投诚士兵。当时张国荃、黄仁葵据襄阳，托名光复。不久，黄仁葵受黄兴之邀，赴南京供职。季雨霖赴襄联络张国荃归顺，并整编军队。

1912年2月3日，季雨霖率本部各员齐聚襄阳，准备攻打盘踞河南南阳的清军。依据计划，拟兵分三路：中央军由新店铺直



1911年12月，革命军攻占荆州城

取新野；右翼军绕道枣阳，出击唐县；左翼军由老河口攻邓州，三路军队拟会师南阳。后因南北议和既成，季雨霖北伐计划中止，奉鄂督令回师。

沙洋筑堤

沙洋堤坝本属险工，屡筑屡溃。最近一次修筑为1911年3月，鄂督命沙洋堤工局总办彭守觉前往兴修，谁知5月风雨侵袭，新堤不能合龙，旋被襄水冲溃，溺亡者不可计数。12月，季雨霖由水路赴荆时，仍见沿河溃口惨状：房屋田园，尽成泽国，颓垣破壁，寂无人烟。加之，沙洋乃季雨霖故乡，于是行军途中即谋划筑堤事宜。

1911年12月29日，季雨霖委派汪秉乾为沙洋堤工总理，李克家、王炳奎等为协理，另委提调监理团防、稽查数人。经勘计堤工，约需款40万串。工程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堤费虽可暂缓，工人工费则需募集现钱支付。31日，季雨霖致电黎都督，称若待军政府指拨公款，款必无着，现在勘验堤工约需20万两白银。拟向沙市、沙洋商

会和自治会筹借白银 10 万两，尽速开工。

1912 年 1 月 2 日，季雨霖发布筑堤公告，称沙洋堤工，关系荆、江、潜、监、沔五邑生命，尤为慎重。并勉励办事人等，不可固执己见、营私舞弊；工役人等，不可浑水摸鱼、以次充好。

由沙洋、沙市两商会担借的 20 万两白银，拟发行公债票，由明后两年的钱粮摊还。告示载明，此次募集公债由官钱局担保公债本息，并呼吁当地商民踊跃应募。同期发布的堤工公债简章，载明了公债数额、息金数额、偿还方式等细节，如公债票分壹元、伍元、拾元三种；息金以五厘计，征收钱粮附加税以二成计；公债价格以九五折募集。

实际负责筑堤人员为汪秉乾、李赞丞、熊树棠和杨经曲 4 人。除李赞丞曾留学日本学习土木工程外，其余均非专业人员。修筑过程为：先筑月堤，拦截水流；再以沙投水中，修筑堤基；然后号召民夫挑沙，按指定路程远近，规定沙价，收工后兑现。

筑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合龙”步骤。这一步骤采取“金包银”的方法，即堤心用沙，堤帮用土，沙土比例各半，沙能受水，土能固沙。待合龙后，堤工已成功大半。湖

北军政府听到这个好消息，当下由理财部拨经费 10 万元。整项工程于 1913 年 5 月告竣。都督府曾派参军杨开甲验收无恙。堤成之后，沙洋人士感念季雨霖的功绩，称之为“季公堤”。

反袁倒黎

鄂北招讨任务结束后，季雨霖部曾被改编为第 8 镇（后改为第 8 师），季雨霖任统制、师长，不久辞职。时逢黎元洪与袁世凯勾结，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湖北地区革命果实遭到破坏。

1913 年，国民党竞选获胜，宋教仁在组阁前夕遇刺，湖北地区革命党人掀起反袁倒黎斗争。黄兴写信致季雨霖、詹大悲、蔡济民等人，希望党内同志振奋精神，继续革命。4 月，季雨霖等人商议成立改进团，公推季为团长，务求改进湖北军政，汉口和武昌均设有秘密机关。改进团积极联络退伍军人，相约举事。但在黎元洪的严密监视下，改进团机关不幸被侦破。第 6 旅旅长杜武库、第 5 旅参谋罗炳顺、团长容景芳等人在汉口被捕，全城宣布戒严。黎元洪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季雨霖与田桐、詹大悲等人避走上海。

黎元洪查抄了季雨霖的两处住宅。依据供词，将季雨霖、曾尚武、熊秉坤列为要犯，全国通缉。向北洋政府报告鄂乱情形，并请袁世凯褫夺季雨霖勋位。黎元洪还组织军法会会审，对季雨霖等人进行缺席审判，待其归案后执行绞刑。对已被捕的容景芳也判处绞刑，行刑

黎副總統宣布鄂省匪亂之通告
案副總統日前通電布告云此次季雨霖曾尚武熊秉坤等煽惑軍人倡謀內亂一案前因季等擅離職守携款潛逃抗匪不案終於昨日通電限期十日投案對質否則通飭緝拿於電請中央各省派員會審是日奉行奪季熊曾等勳位官職歸案查辦由鄂組織軍法會審提集一千人證訊明呈辦復於巧日奉電轉飭季雨霖等遵限投案詳加研訊分別登落並將供開送等因各在案現在限期已過此等要犯重案勢難久懸本都督業已遣可組織軍法會審懸案待質該犯官等限不到即係情虛畏究前案既已供認確鑿自可照章缺席裁判請令執行惟念該犯官等曾共患難不無勞績若再展限十日仍令投案對質予以陳訴之權以示寬大俾同人曉然於本案公理之是非或共諒元洪不遺故舊不濫法權之本意如再展限不到即是自願喪失陳訴之權至會審判決核准之後無論如何陳訴斷不能發生効力國家惟有執法相從元洪亦不能因私情而廢公義也至本案供證一經對質定案自當宣布刻下案情未定供詞甚多不發表惟現獲之容景芳等各犯均係陸軍官佐與季等直接之人軍法處均係待立訊問絕未沿前清通飭刑訊陋習毫無強迫所供各罪巨款主使租房等情均屬聯絡軍人各情均有奉印親筆各供彼此同登前後一致證據鑿鑿聯合先電聞

《亚细亚日报》1913 年 4 月 25 日报道黎元洪“匪乱”通告

之前，因江西、安徽、广东、湖南四都督通电，谓不可滥杀，才暂缓执行。

安徽都督柏文蔚援引“张（振武）方（维）案”，为季雨霖辩解，称黎、季之间是政见不合，并称季雨霖引发鄂乱尚需调查，是为疑案，反对黎元洪污之为匪徒。《中国日报》也发表季雨霖的辩词，称犯罪必依证据，鄂督通电舍证取供，显无法例。季雨霖案是否为冤案，甚至引发不同背景报馆争端，革命报刊《民主报》称季系被冤抑；《大共和日报》和《亚细亚日报》则称其为鄂省叛党。

6月，季雨霖回武汉住日本旅馆，詹大悲住英租界大达医院，与蒋翊武等人将改进团改名为参谋团。季雨霖令其驻沙洋旧部刘铁在当地宣布独立，并计划会合钟祥、京山、天门、沔阳各地起义力量，齐集仙桃，直捣武昌。黎元洪电告袁世凯派兵镇压，因“二次革命”中湖北起义队伍分散、孤立，难以坚持，改进团成员再次逃往湖南、上海。季雨霖随后赴日，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但仍与国内革命党人保持密切联系。

护法身死

历经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和段祺瑞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召集国会等一系列闹剧，革命党人捍卫的民主共和制度岌岌可危。

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和襄郢镇守使兼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早年参加同盟会，后又参加辛亥革命，与革命党有较深的关系。在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人的激励下，石星川和黎天才发起“荆襄独立”，组成湖北靖国联军，黎天才被推举为联军总司令，曾在

鄂西指挥护法运动。

季雨霖、阙龙、梁钟汉拟组织护法军，图谋北伐。其间，阙龙在仙桃筹备并负责教练军事，由杨永森筹措军饷，积极招募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农民入伍，聘请秀才胡会文为参谋，逐渐聚集农民两百余人，计划于1918年1月1日起事，攻打仙桃水警炮船和财神庙军械处。不料有两名革命党人被捕，遭到严刑拷打。最终起义提前两日爆发。

起义农民兵分三路，一路进攻财神庙，救出被捕同志；一路进攻油榨湾复顺典当铺，一直到达傅家台、十全街；南面由阙龙率领，进攻龙华山，直抵襄河边。待天色大亮，清点战绩，共烧毁炮船6只，缴获步枪12支，小炮2门。因汉川梁钟汉援军未至，又遭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出第二混成协来仙桃镇压，阙龙连夜奔赴沙洋，避住季雨霖所设护法联军司令部。

时值湖北靖国联军发生分裂，黎天才诬指季雨霖在仙桃、沙洋一带烧毁民房、劫掠典当、勒索商会，斥为土匪行径，并于1918年2月派兵将季雨霖与阙龙刺杀。不过，另有报纸揭露，黎天才的暗杀行径是为夺取军权，投靠湖北督军王占元。因黎天才部对于革命党一概排斥，鄂省革命党遂自谋独立，但被当局视作匪祸。

季雨霖为维护共和，两度北伐。第一次北伐未竟，因南北议和，占据新野的军队被黎元洪申斥退回。第二次北伐，系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对抗各派军阀对共和制度的破坏，在北伐途中献出了宝贵生命。季雨霖的事迹，体现了一个革命先行者的执着追求和英勇气概。

魏德勋，辛亥革命博物院院长、研究员；黄婧，辛亥革命博物院馆员

向警予秘密埋葬处补乾亭“现身”

◇ 侯红志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腥风血雨弥漫江城。1928年5月1日凌晨，党的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向警予，在汉口余记里空坪刑场（今黄石路中学操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

向警予的革命伴侣蔡和森，在《向警予同志传》中描述：“警予引渡之日，武汉劳苦群众人山人海，都来瞻仰此将要永别他们的领袖；警予慷慨激昂，沿途向群众高声演说，大声高呼一切革命口号。”

3月20日，向警予因叛徒出卖，在汉口三德里96号被法租界巡捕逮捕。4月12日，由法租界巡捕房引渡至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关押于看守所。4月14日、17日、18日，武汉卫戍司令部军法处三次审讯。向警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狱中，她鼓励和领导难友进行绝食斗争。她在狱中写给儿女的诗和儿歌，表达了对骨肉的殷切期望、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1978年5月，为纪念向警予英勇就义50周年，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决定在汉阳

龟山西首修建向警予烈士墓，并建立向警予烈士纪念馆。1986年10月，武汉市政府又将安葬有数百名革命烈士的红色战士公墓迁移至此。

向警予烈士墓由邓小平题写墓名，红色战士公墓由彭真题写墓名。向警予烈士墓、纪念馆、红色战士公墓三者相连，成为武汉一处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纪念地。

忠魂掩埋乱坟堆

向警予和红色战士公墓里的大部分革命烈士，牺牲于汉口余记里刑场，为何在半个世纪后集中安葬汉阳龟山？

1928年5月1日凌晨，敌人枪杀向警予后，烈士遗体置于荒凉的空地上。当天深夜，家居汉阳毛家堤的陈春和，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刑场，将向警予的遗体偷运至汉水边，用木船渡过汉水运到汉阳，埋葬在龟山西段南麓的补乾亭旁。

补乾亭，俗称六角亭，是一处庭阁式



汉阳补乾亭，上图左侧远方为古琴台建筑群

建筑，建于清代。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严昌洪教授告知笔者：“龟山西南原有补乾亭，意为补足风水。由清道光二十六年知府夏廷楨建，同治年间知府周乐重修。补乾亭位于今汉阳红色广场附近，20世纪50年代因修建长江大桥而拆除。”严教授是老汉阳人，他还说：“我年轻时经常从补乾亭那里经过，对它很熟悉。”

补乾亭（六角亭）由于是向警予遗体的秘密埋葬地，《武汉通史》《武汉地名志》《江汉史话》等均有记载，受人关注。但是，补乾亭均未登载照片，即使向警予烈士纪念馆也无照片展陈。

最近，武汉文史研究者惊喜发现，最新出版的一本《汉阳百年影像》画册，登载了三幅补乾亭老照片。一幅照片中，补乾亭左侧出现汉阳古琴台建筑群，亭子与古琴台之间的空地上，可见连绵成片的坟堆。另两幅照片中，补乾亭近旁的坟堆也清晰可见。

当年，陈春和以驾船为掩护，将烈士遗骨从四处收集一起安葬于此，也与此地形同乱坟岗，不易被敌人发现有关。

《汉阳百年影像》主编麻建雄介绍：三张照片中有两张为比利时人菲利普·斯普鲁伊特于1898—1908年间拍摄。这位比利时医学博士1898年来汉口，受聘为卢汉铁路项目医生，1908年11月40岁时在汉口逝世。在武汉工作的10年间，他拍摄了大量照片。

陈春和前赴后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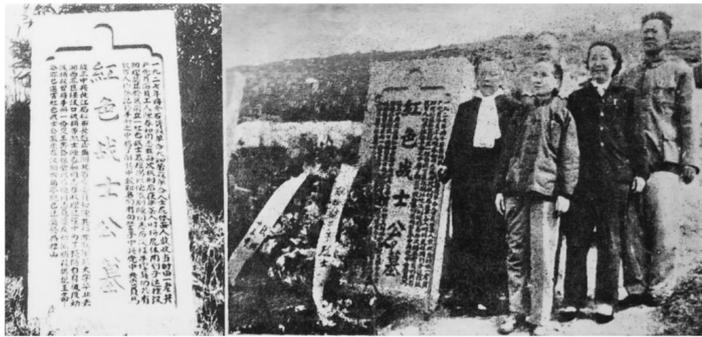
在龟山向警予烈士纪念馆里，展陈有一幅“陈春和运送烈士遗体手绘图”，描绘他深夜用木划子运渡向警予遗体的情景，同时绘有陈春和遗像和一个“红色战士墓”碑。展板上写道：陈春和在将向警予埋葬于补乾亭下之后，又多次潜入余记里刑场，将被敌人屠杀后的烈士遗体收敛安葬于此地。

陈春和是谁？此前史料对他有“海员工人”“共产党员”等多种介绍。向警予烈士墓修筑后，武汉党史研究部门在墓园设置“土地革命时期在武汉牺牲的著名烈士生平事迹简览”，其中有相关介绍：陈春和（1876—1929），祖籍湖北黄陂，童年时随父到汉阳县城谋生，1923年初，经许白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武汉地区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

1927年七一五事变后，在汉阳龙灯堤一带坚持地下斗争。12月中旬，出席在汉口秘密召开的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省监察委员会书记。次年春夏，武汉地区党、团、工会组织遭到空前大破坏后，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当时中共济难会组织已被破坏无遗，有些遇难者的遗体无人收殓，陈不顾个人安危，深夜潜入刑场，将遗体运至汉阳龟山六角亭安葬，立牌为记。是为武汉现“红色战士公墓”的由来。



1938年，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来龟山红色战士公墓凭吊



1964年6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监察部部长钱瑛等领导来扁担山红色战士公墓凭吊

1928年11月，省委复遭大破坏，陈再度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12月，与重建的省委恢复关系，任汉阳县委书记，下辖13个党支部，106名党员。曾领导汉阳人力车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并取得胜利。1929年2月，陈春和在汉阳家中被捕，3月4日，与省委书记夏文法等人被杀害于武昌文昌门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武汉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陈春和冒着生命危险将烈士遗体收集到一起，掩埋于汉阳龟山补乾亭后，并在墓前立了一块“红色战士墓”短碣。埋葬者共有数百人，均由他记入了名册。陈春和牺牲后名册遗失，知情者后来回忆起的知名人物，仅有向警予、马骏三、陈其科、赵世当。

在墓园“著名烈士生平事迹简览”中：马骏三（？—1928），安徽人，又名骏三、浚三。1925年以前即入党团组织。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任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长。次年5月任武昌县委书记。6月下旬，调任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2月3日，调任汉口市委书记。3月13日，在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后，不知省委交通站福昌旅馆被破坏，仍照事先约定前往接头，被守候的军警逮捕，旋被杀害于汉口余记里空坪。

赵世当（1908—1930），湖北通城人，化名徐文杰，在武汉市委负责技术工人方面的工作，1930年在汉口被捕遇害。

原址建为红色广场

1955年修建长江大桥，引桥从补乾亭旁经过，红色战士墓由汉阳区城建委迁往扁担山墓园，重新修墓立碑。

红色战士墓附近，还有一座“铁血将士”之墓，埋葬着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阳夏争夺战中牺牲的民军尸骨，俗称“万人坑”，1955年亦迁往扁担山。

补乾亭原址，现为—座公园式纪念地——红色广场，1965年设计，1980年动工，位于长江大桥引桥马路与鹦鹉大道交汇的三角地带，占地1.72万平方米。

红色广场中央立有长方形纪念碑，为钢筋混凝土建筑，坐南朝北，面向琴台。正面镶嵌四块正方形白色大理石，上刻阴文“红色广场”四字，碑后松林为屏，碑前三个花坛并列，两侧遍植女贞、紫荆，四周花团锦簇林木长青。

侯红志，原武汉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

蛇山上的“十桂堂”

◇ 杜宏英

武昌蛇山首义公园，有一处历史建筑“十桂堂”隐匿上百年，身世至今是谜。

最近，在2019年版《黄鹤楼志》中见到一段记载：“十桂堂位于抱冰堂东南侧。据《续汉口丛谈》记载：‘（抱冰堂）园中花木极饶风致，亭台（十桂堂、茅亭、月台）亦复参差。’张之洞曾称其为‘湖北署中第一名胜之区’。2010年，原武汉市文物商店与武汉市博物馆合并后，四万余件珍贵文物入藏博物馆，这批文物中就有张之洞的《行书七言对联》‘鱼鸟亲人濠濮想，桂山留客楚骚辞。’联中小记：‘请命入觐，长夏无事，因忆十桂堂为湖北署中第一名胜之区，其余小蓬壶、魁星阁不足以较其短长，而十桂之楹联清新雅饬，尤为吾惬意之作。今幸案头有残笺破纸，不妨喜为书，以志不忘。’”

为解“十桂堂”身世之谜，笔者多方探寻发现，“十桂堂”不仅与张之洞相关，还有许多名人都曾造访，留下一段又一段趣闻佳话。

何人命名“十桂堂”

赵寿强《张之洞诗稿详注》载梁鼎芬《寄题十桂堂（有序）》曰：“武昌节署园有十桂，孝达尚书取以名堂。”孝达，张之洞的字。由此可知，湖广总督署有“十桂”，张之洞取为堂名。

梁鼎芬，广州番禺人，晚清文学家、诗人，张之洞督鄂时，入张之洞幕府，为张所倚重，聘为两湖书院院长，后官至湖北按察使。他擅长诗文，与张之洞、陈三立、杨锐、康有为等常有诗书往来，《寄题十桂堂（有序）》就是与杨锐等人的酬唱之作。

张之洞是一个尚贤爱才之人，从担任山西巡抚起，就开始招纳贤才筹建幕府。到湖广总督任上，周围已聚集大批诸如陈伯严、陈斗垣、杨叔峤、江孝通、梁鼎芬、程颂万、赵凤昌等贤才，形成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幕府之一。门人易顺鼎说：“南皮师为海内龙门，怜才爱士过于毕沅，幕府



张之洞肖像

人才极盛，而四方宾客辐辏。”龙顾山人郭则沅《十朝诗乘》亦说：“文襄督鄂，士流多归之。”

同时，《十朝诗乘》曰：“署园有十桂，皆老干出云，因以‘十桂’名堂，自题额跋云：‘树皆旧物，不知为郭华野、孙文定、阮文达、林文忠何人所植，名此以著封殖嘉树之意。’”

桂树是中国传统十大花卉树木之一，古代书院、文庙、贡院喜种植桂树，一来桂花是“吉祥”的象征；二来“桂”与“贵”谐音，有“荣华富贵”的寓意；三来在科举时代，“蟾宫折桂”就是进士及第的雅称。再加之桂树寿命长，一般可活几十年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读书人有种植桂树的雅好。

《十朝诗乘》所言的郭华野、孙文定、阮文达、林文忠四人，曾先后就任湖广总督。郭华野，康熙三十八年（1699）任湖广总督；孙文定，乾隆六年（1741）调湖广总督；阮文达（阮元），嘉庆二十一年（1816）擢湖广总督；林文忠（林则徐），道光十七年（1837）升湖广总督。四人皆为文人雅士，拥有种植桂树、祝福美好的诉求。即使“十桂”为林则徐来湖北后栽种，桂树也早已“老

干出云”遒劲苍秀，每当花开季节十里桂香落英缤纷，张之洞感为“湖北署中第一名胜之区”，遂取名“十桂堂”“以著封殖嘉树之意”，实乃情理之中。

何人建筑“十桂堂”

有人说，“清末民初为纪念张之洞，在山上修建了抱冰堂、十桂堂及奥略楼等纪念建筑”，但从所查文献显示，“十桂堂”的来源有二：一说“十桂堂”为张之洞督鄂时所筑；一说“十桂堂”由明初楚王朱桢祭祖宫殿改建而成。

1999年，广州百花出版社出版的文史随笔《桑榆剩墨》，著者是上海退休教师兼翻译达人黎泽济。黎先生幼承庭训，其父是清光绪甲午翰林、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大学前身）第二届监督（即校长），他本人又师从以考据见长的历史学家朱希祖，具有扎实的史学功底。退休后，他以笔墨文字遣兴消闲，得清末以来有关人物、习尚、史事、文林、艺苑等随笔近百篇，结集而成《桑榆剩墨》。因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颇有“钩沉勘误、剔误抉微”之效。

《桑榆剩墨》载：“（陈仲恂）抗战时期旅蜀，咏华严洞双桂七绝：‘檀乐花鸟乞春多，奈此伤离念乱何。十桂堂中珠履客，今来绝域抚寒柯。’末注云：‘张文襄督鄂时，于署傍构十桂堂，花时集幕客为文酒之会。’时仲恂任财政部秘书，闲曹冷官，落拓渝州。回首前尘，自不胜今昔荣枯之感。”

经查，陈仲恂，湖湘近代诗人，儒学大家王闿运学生。张之洞督鄂时，梁鼎芬主持两湖书院。陈仲恂入两湖书院就读，因“先世渊源，重以师门援引”“亦得随待张之洞”，对张之洞及其署衙事物洞悉颇深，对“十桂

堂”及其与之所发生的“文酒之会”亦应了若指掌，其言“（张之洞）于署旁构十桂堂，花时集幕客为文酒之会”应是史实。

无独有偶，《湖北文史资料》1987年第4期登载北伐名将李之龙之弟李之骥的《李之龙筹备蛇山公园的往事》，其中回忆道：“之龙写了一个蛇山计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就清代末年两湖总督张之洞在大东门旁修筑的抱冰堂左右的十桂堂、梅廊等建筑设备修理充裕，平整山径；第二期：增设禽囿、兽园，随地区地势高下，散置岩洞以及八阵图趣院，将杂生树林改变为四季花木代表区，设老人盘桓区、青年友好娱乐区、儿童游戏区；第三期：在适当地区，建立旅社、食堂、浴池。并请拨发开发费。”

李之龙，1897年出生于湖北沔阳（今仙桃市），6岁时随父来汉就读于武昌两湖师范附小，参加革命后又曾任教武汉中学，武昌俨然是其第二故乡。他对武昌的山水草木、人物风情既熟悉又亲切，对蛇山的名胜风景、历史人文更是如数家珍：“过春节的时候，街上灯光明亮，我就和我堂伯弟弟，到长街南楼看灯笼市场；到了春风拂面，山上草青的时候，我们就提着纸蝴蝶、彩八卦，爬到高冠山顶放风筝，放到黄鹤楼；我们上抱膝亭，就可望到长江面上的帆船往来。”

李之龙来汉求学之时，正是张之洞督鄂之际，耳闻目睹其在湖北的作为，若非确有其事，他不会妄言“张之洞在大东门旁修筑的抱冰堂左右的十桂堂”。

综上所述，“十桂堂”乃张之洞所筑。

但另据武昌民间文史专家刘谦定所言，“十桂堂”于民国初年改为“忠烈祠”。关于“忠烈祠”的来历，据武汉市人民政府《重修烈士祠记》碑和武昌民间史学爱好者刘翔《张之洞路，“烈士祠”的前世今生》



烈士祠牌楼

一文所述，“忠烈祠”最早建于明代，原为楚王朱桢祭祖宗庙，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改建成“万寿行宫”，专门用以接待来鄂的朝廷高官和皇亲国戚。清中叶以后，改辟为“皇殿”，供在鄂而又无暇回京的满族官员遥祭祖先。武昌首义胜利后的1911年11月9日，即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一月后，湖北军政府特派遣孙武、蒋翊武、蔡济民为代表，向三烈士致祭，后此处便供奉三烈士遗像和其他牺牲的辛亥首义诸烈士灵位。1938年初，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在此设表烈祠，供奉该军十三师阵亡病故官兵灵位。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在蛇山南坡建忠烈祠，用以表彰先烈、供奉抗战中阵亡的将士，表烈祠就变成了忠烈祠。2011年武汉市人民政府重修时更其名为“烈士祠”。重修后的烈士祠占地约600平方米，由牌楼、甬道、神阶、翼楼和享堂等组成。牌楼为水泥结构，三门双层飞檐，额书“辛亥首义烈士祠”七个大字。享堂供奉有辛亥首义烈士和武汉会战牌位，同时，还开辟“武

汉会战陈列”展览，此处成为祭祀抗战英烈的国家级博物馆。

文酒会所“十桂堂”

“十桂堂”为张之洞宴朋会友的场所，经常“觞咏其间”，留下许多感时抒怀之作。

1890年，“新政重臣”陈宝箴调任湖北按察使，其子陈三立随行。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的代表人物，与谭延闿、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在汉侍父期间，陈三立与张之洞及其幕僚间文气相投，酬唱往来不断，张之洞更是与陈三立有忘年诗友之谊。据说，张之洞督鄂时，“尝聘陈校阅经心、两湖书院卷”，张待陈“备极礼敬”，陈“常为之洞坐上客”。

1893年清明节，陈三立招梁鼎芬、易顺鼎等人楔集于武昌曾文正祠。张之洞获悉后，特遣人惠以酒食于“十桂堂”。为答谢张之洞厚意，陈三立作《三月三日楔集曾文正祠为诗钟之戏南皮督府因惠酒食赋谢》：

“朝郭晴云动，山祠花树春。歌呼兼稚子，江海见雄人。龙虎吹成气，龟蛙闹有邻。古来无此乐，烧烛白如银。明公宜泛爱，吾党已能狂。题句依兰坐，分餐到桂堂（湖广总督别院曰十桂堂）。风云驱梦寐，醉饱溷沧桑。欲逐陈莺散，楼台未可忘。”诗中“分餐到桂堂”一句，作者自注“湖广总督别院曰十桂堂”。别院，顾名思义，是正宅之外的同属于一个主人的另一处宅院。这样看来，“十桂堂”不仅是张之洞的“文酒会所”，还是其私家别院。

1905秋，陈三立受命来武汉办理南浔铁道债券的征订事宜。到武昌后不久，张之洞就于“十桂堂”宴请。席上陈三立即兴赋有《十桂堂前雨赋呈抱冰宫保》，生动描述

了“十桂堂”宾僚歌咏酬唱的场景：“藤棘垂丝桂排廊，坐间微雨洗秋香。支颐啜茗危大，负手着花意思长。曾向池亭怜舞鹤，只今觞咏答寒螿。宾僚久惯依迂叟，余事论文未可忘。”既答谢张之洞，也是个人家国情怀的流露。

此前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张之洞六十大寿，学生杨锐（杨叔峤）从北京来鄂祝寿。杨锐与张之洞关系亲密，是张所看重的学生之一。后来，张之洞推荐杨锐到北京任职，成为张之洞的“坐京”（驻京办事处的主任）。杨锐返京前夜，张之洞招梁鼎芬、杨锐于“十桂堂”话别，三人相知相交、亦师亦友，兴致高昂联句寄情，作《十桂堂夜坐联句》：“佳人不可留，悦此山幽曲。幽花自静妍，闲馆更清淑。……吾道苟不孤，嘉会何忧续。”

张之洞除与幕僚文酒之会外，还曾邀请民国“翰林总统”徐世昌作客“十桂堂”。

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之《徐世昌在小站期间的武汉之行》开篇云：“先祖在小站期间，曾应张之洞之约前往武汉考察、学习。”贺培新辑《徐世昌年谱》载：“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八月杪，航海至上海，换江轮船往汉口，入武昌……”

徐世昌出身翰林，善诗文，工书画，小站练兵初期曾随袁世凯拜会张之洞，并崇拜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徐世昌的才华，也大受张之洞赞赏，坊间甚至传有张之洞轻薄袁世凯却厚爱徐世昌之说。徐世昌在武汉的一个半月里，“遍阅编（织）布厂、缫丝厂、银元局、铁厂、枪炮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及黄鹤楼、晴川阁、琴台诸名胜。”

张之洞热情款待徐世昌，设宴于五福

堂，又“约早饭”“于督署十桂堂”，并“坚留住署内作十日谈”，夜谈至三更后始散。所谈内容，徐世昌在日记里是这样记述的：

“问当今挽回大局之要当从何处下手，芎翁云：‘其要有三，曰多设报馆、多设立学堂、广开铁路。而所以收此三者之效者，曰士、农、工、商、兵；其必欲观此五者之成，仍不外乎变科举。多设报馆，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振天下之聋聊；多立学堂，可以兴天下之人材，或得一二杰出之士以担挂残局；广开铁路，可以通万国之声气，如粤汉之路、卢汉之路、奉天之路，修至伯都讷与俄国之路联接，五六年内一律告成，中国可不至于危亡。’旨哉斯言，高出寻常万万矣！”字里行间，流露出徐、张二人治国兴邦的情怀以及互济为美的心胸。

游览胜地“十桂堂”

张之洞称“十桂堂”为“湖北署中第一名胜之区”。胡凤丹《黄鹤山志》亦言：“数千百年，名区胜迹所留遗，迁客骚人所题咏。”

1923年5月下旬到6月下旬，民国才女石评梅率“女高师第二组国内旅行团”南下考察，在参观湖北女子师范、武昌高师附中后，于5月25日游览蛇山风光，写下游记《武昌的名胜》，以《模糊的余影——女高师第二组国内旅行团的游记》为总标题，发表于《晨报》副刊。文中写道：“抱冰堂建在蛇山上，由下边一级一级地上去，绿树阴蒙中，隐现着红绯娇白和画楼雕梁。……再上去是十桂堂，张叶如幕，桂树林立，可惜这不是秋高月圆时。站在十桂堂的中间由树缝里看见长江如练，民房似带，可以看见纺纱厂的烟筒；黑云萦绕，烟雾轻罩，凉风

过处，心神为之一爽！这是何等舒适逍遥的境界啊！”这篇文笔清丽隽永的游记，读之有身临其境之感，更让我这个武汉人生出心向往之的冲动。

到“十桂堂”一游固然美好，与爱人情话岂不更是惬意？

1936年，上海美专学生乌扎拉（又名吴联膺）随兄长辗转来汉，求学于武汉一家艺术学校。1月3日与女友约会蛇山，漫步于十桂堂林荫小道，眺望月光下的江水，少男少女间朦胧甜蜜的爱情，流淌在他的日记里：“我在底下抬头望她，她笑，绕过浓花荫的十桂堂，里面有灯光，她悄悄地笑，‘两个贼啊！’……”

然而，正如龙顾山人郭则沅在民初所说：“后人知‘抱冰’，未必知‘十桂’矣。”确实，民初“十桂堂”就已改建为忠烈祠，供奉辛亥首义阵亡将士牌位。1960年代变为首义公园报刊阅览室，1980年代又成为武昌区园林局办公室。

“十桂堂”湮没于历史长河鲜为人知，现存的堂基与石碑留下仅有一点念想。已故汉阳区园林局余开来先生，曾在《关于武汉园林风景线的设想》中说：“首义公园的抱冰堂，应维修粉饰，周围可补大桂花十株，恢复‘十桂堂’的声誉。”

期许“十桂”再现蛇山。

杜宏英，武汉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泱泱大国礼乐兴盛的优雅回音

——武汉音乐学院湖北音乐博物馆

◇ 赵路花

武汉音乐学院湖北音乐博物馆，坐落于武昌临江大道之畔，西临雄浑浩荡的长江，是华中唯一一家音乐专题高校专业博物馆。

2010年建馆，前身为武汉音乐学院1988年设立的编钟古乐器陈列室，2013、2016年分别完成编钟馆、古琴馆布展，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在高校云集的武昌，武汉音乐学院集艺术、文化于一体，是武汉面向国内外展示湖北乐舞

艺术文化的窗口，而音乐博物馆则是发挥这项功能最直接的宣传者和推广者。



武汉音乐学院湖北音乐博物馆外景

编钟与古琴奇妙交响

音乐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以湖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乐器“编钟”与“古琴”为展陈对象，设有编钟馆和古琴馆。在这里，可以感受和体验荆楚乐舞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无限魅力。

编钟是古代汉民族重要的打击乐器，兴于周朝，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从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曾侯乙编钟可知，编钟由若干个大小不同的钟，有序悬挂在木架上编成一组或几组，每个钟敲击的音高各不相同。由于年代不同，编钟的形状也不尽相同，钟身一般都绘有精美的图案。

走入雍容典雅的编钟馆，仿佛置身于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乐钟宝库。琳琅满目的古代钟类乐器（仿品），以时代变迁为经纬，勾勒编钟从起源、兴盛、衰落到复兴的过程。同时，通过仿制编钟乐器，如依据擂鼓墩1、2号墓出土编钟重新设计浇铸的楚曾百钟、依据北宋大晟钟复原铸制的大晟钟，讲述钟类乐器的音乐音响性，以及源远流长的钟鼎礼乐文化。

钟乐教学视频的演播，现场编钟的演奏敲响，让观众真切感知到，编钟虽然是较为古老的打击乐器，但其音质、音准、音色，绝不逊色于鼓、锣、钵等民族打击乐器，亦不逊色于定音鼓、铝板琴、军鼓、架子鼓等西洋打击乐器。编钟的地位，在世界打击乐界可谓独树一帜。

古琴又称瑶琴、玉琴、七弦琴，是中国传统拨弦乐器，有3000年以上历史，古代有伏羲、神农、黄帝造琴等传说。关于琴的最早文字记载，则见于《诗经》。在古代，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也兴盛于民间。古琴属于八音中的丝，音域宽广，音色深沉，余音悠远，深受人们喜爱，认知度相当广泛。

驻足古琴馆，拨动古琴琴弦，聆听远古古琴声，可以感受中华古琴文化的博大精深。徜徉展厅，在陈列室回眸古琴发展的历史，了解古琴的制作工艺，感悟古人“琴之为器也，德在其中”的情怀；在书斋观赏古代琴谱和古代文人雅士起居生活的复原场景，宛如回到古时，展现出文人修身养性“调素琴、阅金经”的清雅读书画面；在传习所参与现场古琴演奏互动，可以体悟古琴传承





的音乐魅力，其声称之为“太古之音”“天地之音”，有着非常独特的韵味。当你摒去浮躁，寂然凝思，静听琴乐，能真实感受古琴散发的宁静悠远的气息，让人肃然祥和。

音乐博物馆收藏及展示的古乐器仿品及实物，演绎着泱泱大国数千年礼乐兴盛的历史，一些特色仿品工艺精湛，具有较强的实用与艺术审美价值。

“楚曾百钟”仿品

“楚曾百钟”依据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64件曾侯乙编钟和2号墓出土的36件青铜编钟，重新设计、组合而成。编钟分三层三面悬挂，其中左、中两面仿自1号墓出土曾侯乙编钟，右面仿自2号墓出土编钟。

1978年，随州曾侯乙编钟的出土震惊世界，学界纷纷展开相关理论研究。武汉音乐学院作为音乐艺术专业院校，成为编钟理论研究、音乐创作和艺术实践的主要阵地之一。1988年，武汉音乐学院教授童钟良在“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擂鼓墩出土编钟，在音乐性能方面具有“百钟互补”的现象。

据此，武汉音乐学院教师根据当代音

乐演奏实践的需要，设计、铸造了楚曾百钟，并于1991年在编钟音乐厅落成之时，陈列并使用在音乐厅背景台上。

2013年，楚曾百钟作为重要展品，陈列于音乐博物馆的编钟馆，展现在编钟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同时，它也深受大家喜爱和关注，经常出现在各种纪录片、宣传片及新闻媒体的镜头里，为传播中华编钟艺术文化贡献力量。

木雕“俯身三道弯”

此件藏品为木雕艺术品，作者苏祖谦，创作原型是83版《编钟乐舞》“俯身三道弯”这一经典舞蹈动作。由该舞蹈动作的创编者、国家一级编导熊干锄先生2018年捐赠。

201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40周年，音乐博物馆以此为契机，立足于武汉音乐学院的学科优势，举办《编钟乐舞艺术实践展》。其中，湖北省歌舞团的83版《编钟乐舞》影响广泛，享誉世界，是具有代表性的编钟音乐艺术实践创作精品。因此，武汉音乐学院对其部分主创者进行了采访，包括编导熊干锄，总策划蒋桂英，作曲龚国富、刘民则、万传华，了解到一些不为人知的幕后创作故事。

熊干锄回忆，他刚接到《编钟乐舞》舞蹈创编任务时，既激动又茫然，激动的是能为国宝编钟量身定做乐舞，茫然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编钟如何演奏表演并没有详细的文字、图式流传下来。正当他发愁之时，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谭维四，寄给他一张“战国采桑宴乐射猎攻战纹铜壶”的器物展开图。他顿时受到启发，与创作团队赵卫平、



杨凤仙等人商讨后，主题着眼于“民以食为天”，选取“采桑”“耕耘”“渔猎”等农事方面的内容进行创作。而“俯身三道弯”，便是“采桑”中的舞蹈动作。

熊干锄具体谈到“采桑”的编舞细节：

“一个舞蹈要有基本体态和动律。确定‘采桑’后，我们就开始讨论基本动作。我的想法就是：这个舞蹈像一幅壁画，然后造型、切光，结束。根据铜壶上的‘采桑’形象，考虑到楚地舞蹈‘飘逸轻柔’的风格，我先尝试以腰部为中心，挺胸撅臀做了一个动作。赵卫平让我将幅度增大、拉长。调整后，她和杨凤仙觉得动作很优美，而且也很符合农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特点。然后就是韵律，怎么动起来？很简单，就是走相反的动作。蒋桂英老师看了特别满意，还将我们这个‘三道弯’的造型，作为整个剧目的代表性舞蹈表现语汇。”

在采访现场，熊干锄虽年过花甲，仍兴致勃勃演示讲解舞蹈动作。据采访的老师说，熊干锄表演时，恰好窗外一缕阳光洒过

来，刹那间让人感受到“这个舞蹈像一幅壁画，然后造型、切光，结束”，是那样的优美。

《诗经·小雅·鹿鸣》云“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音乐博物馆古琴馆是荆楚古瑟、古琴艺术（泛川派）传承基地，以教学暨雅集活动广交子弟师友，进行古琴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武汉音乐学院丁承运教授，师承泛川派古琴大师顾梅羹，以第四代嫡传弟子成为国家级非遗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他和湖北省非遗古瑟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付丽娜、武昌区非遗

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丁霓裳，形成了武汉音乐学院独有的人文资源。

音乐博物馆依托人文资源优势 and 馆藏特色，策划、设立编钟礼乐、古琴艺术、非遗文化等多类别的音乐舞蹈类主题的工作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编钟礼乐工作坊，围绕编钟历史文化、音乐艺术、铸造工艺等内容，开发编钟绘画及模型涂鸦、墨拓菁华、版画拓印、编钟剪纸、考古发掘等系列活动，吸引了许多市民参与其中、乐在其中。

赵路花，武汉音乐学院湖北音乐博物馆馆员